



《品读武汉老字号》延续“品读”系列图书经典，打造市政协特色文化品牌。全书遴选武汉三镇各类老字号42家，从创业始末、历史经纬、经营之道、特色产品、传统技艺、发展现状等方面对老字号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品读，特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德钧教授组织撰写编订，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整理留存一段关于武汉的“城市记忆”。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朱向梅 李定君

董菲 杨华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李运玲 杨萌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陈红英

徐莉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郑雅飞

编辑：许濛 严濂

特约编辑：华蕾 张川蕾

游迎

封面设计：王鹏

老字号脉

- 4 武汉老字号：一段记忆，一片乡愁
——《品读武汉老字号》代序 / 周德钧

九城同心

- 11 情注这方红土地——董必武与黄石 / 朱俊峰

三镇拾遗

- 17 汉口“梁记药房”探访 / 韩少斌
20 汉阳公园发现1964年“汉阳树”碑刻 / 胡全志 严涛

委员天地

- 25 绿水青山好作伴 / 张继
28 我走过的万里家访路 / 施婧

商聚汉皋

- 32 “健康”是人生头等大事 / 董林艺（口述）舒赢（整理）

目录

CONTENTS

人物春秋

37 郑凯卿：“文华”走出的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 / 付强

往事漫忆

43 古德寺腾退记 / 麻杰

都市史话

49 探寻蛇山上的古刹道仙（下） / 董玉梅

史海钩沉

54 武汉坤伶“小京班” / 龚宝珣 胡萍

目录索引

60 本刊 2022 年总目录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价：8 元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编：430010

电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ssl@163.com

武汉老字号：一段记忆，一片乡愁

——《品读武汉老字号》代序

◇ 周德钧

编者按：在武汉市商务局的大力支持下，本刊年初开设的《老字号脉》专栏，至此已组稿刊文 22 篇，集中展示具有代表性的老字号风采。在受到读者欢迎的同时，武汉图书馆网站“地方文献”逐期转载，武汉档案馆跟踪收集相关藏品史料，获得良好社会反响。专栏收官之际，恰逢《品读武汉老字号》一书出版，特选发其“代序”以窥全貌，重温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

老字号对于其所在的那座城市，不啻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它们看上去虽不免老旧，却是彰显一座城市底蕴的“家当”。它们的存量多少，足以显现一座城市的历史厚度。而它们的种

类与品质，则是一座城市过往身世、繁华或者落寞的生动写照。

甚至可以这样说，老字号是一座城市历史感的最直观体现。一般而言，一座城市历史越是悠久，老字号就越多，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就越是深厚。

武汉老字号知多少

武汉老字号有多少呢？

按现在官方的认定，武汉有“中华老字号”13家、“湖北省老字号”18家、“武汉市老字号”61家。看上去数量不算少，但与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相比则显得并不多，尤其是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的仅

13家。显然，这与武汉作为中国近代商业重镇的历史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如果广义地看待这一问题，以经营时间和历史影响来评定老字号，那么，自明清以来，汉口市面上的店铺数以千计，当年汉口的汉正街、长堤街、大夹街、小夹街、黄陂街、花楼街，武昌的长街、粮道街、察院坡，汉阳的显正街、西大街都是店铺林立的商业街，中间有多少老字号？说成百上千是毫不为过的。

兹将民国时期《武汉指南》中记录的商店字号，摘取其中部分列于下：

布匹店：谦祥益、和记、志成、怡和、国大、永康、礼和、永和等。

绸缎店：鸿彰永、九华、悦新昌、大成、恒昌等。

百货店（又称广货店或京广日杂店）：维新、戴春林、马入和、大成斋、瑞生祥、豫华、万成等。

金号银楼：邹协和、老凤祥、天德楼、天宝楼、老万年、老大宝、老同兴等。

餐馆酒楼：老大兴园、会宾楼、德华、四季美、老通城、楚珍、筱陶袁、五芳斋、伍亿丰、福庆和、福星居、郭镒泰、蔡林记、谈炎记、祁万顺、野味香、春明楼、一江春、普海春等。

食品店：汪玉霞、曹祥泰、九如斋、五芳斋、冠生园、毓华、美的、滋美、邦可等。

钟表眼镜店：精益、汉明、亨达利、明光等。

中药店：叶开泰、九芝堂、刘天保、吴寿康、金同仁、达仁堂、九千年、陈太乙、刘有余、三多轩、初开堂、同丰泰、葆和堂等。

茶肆戏园：汉南春、洞天春、话雅、怡心、长乐、威严、共和、老圃、美成、天声、满春、大舞台、新市场、凌霄、康登等。

照相理发洗浴店：显真楼照相馆、品



汪玉霞图画

芳照相馆、启新照相馆、长生堂文武理发店、东方理发厅、中国理发厅（后改为上海理发厅）、东华园浴池、长胜池、清泉池等。

文化用品店：宝晋斋、荣宝斋、邹紫光阁、胡开文墨店等。

其他类（著名作坊品牌）：苏恒泰伞铺、高洪太响器店、盛锡福帽店、白海记制衣店、老锦春酱园、老天成汾酒糟坊、邹恒顺翻砂炉坊、黄志成拆货店、义顺成广货店、德厚荣山货号、汉昌皂烛厂、康成酒厂、太平洋肥皂厂、福新面粉厂、申新纺织厂等。

上列种种，只是旧时武汉工商字号的一小部分，它们中的大部分已被岁月湮没，如今仍在我们的生活视线之中的可谓寥若晨星。但这丝毫不能说明老字号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远离了我们的城市。正如城市中的一道街景，并不会因为这条街消失了，人们对它的记忆就随之消失，实体不在了，对它的记忆或许还会存留很长一段时间。老字

号之于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群，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工商业实体，而是倾注了我们生活情感的“老物件”，也是承载着我们满满回忆的一种文化符号。

老字号是一种城市生活的交集

由此说来，所谓老字号，似乎可以给出一个更具有文化内涵的定义。

它不仅指称那些年代久远的工商业经营实体，也不仅是一些传统的驰名品牌或者优秀技艺，它还是一种城市文化符号，或者说是一种城市文化资源。

老字号蕴含着过往的一段岁月，承载着一段城市生活的记忆，是城市生活中地域性与年代感的生动标志。犹如乡间村头的一棵老槐树，或是村旁小溪上的青石桥，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而言，一见到它便知这是我们的家园。如同汉口江汉关的钟楼、大智门火车站的老站房，一看到它们，就让人们想起老汉口的模样。

老字号唤起人们的城市记忆，缘于它与市民共同拥有一段城市生活。在这段生活

中，彼此间产生了亲密的互动与交集。

清末的京城，市井中就有“头戴‘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的民谣，道出了老北京人与老字号的亲密交集。看过居住台北的老北京人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描写了作者离开北京已四五十年了，然而对于全聚德、瑞蚨祥、六必居的记忆依然清晰，犹如昨日，可见老字号与人们的生活关联是多么紧密。同样的，在许多上海人的记忆里，他们人生的好多“第一次”就是与老字号连在一起的，例如在“大光明”看的第一场电影，在“亨达利”买的第一块手表，在“吴良材”配的第一副眼镜，在“王开”拍的结婚照，结婚时穿的“培罗蒙”西装、戴的“老凤祥”首饰，每年中秋节到“杏花楼”买月饼……

在我的生活经历中，老字号也是早年生活的一种记忆。说到叶开泰，就想起祖母常年喝的虎骨追风酒。看到福庆和，就想起刚刚工作时的情形：每天早晨骑车乘曾家巷轮渡到武昌上班，途经民权路，每每要到福庆和“过早”，通常是一碗清汤粉，偶尔开开荤来一碗牛肉粉。店堂里热气腾腾的大汤锅，站在锅边下米粉的老师傅，便是福庆和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记。

其实，我们城市中的许多人都与老字号有着不同程度的交集，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老字号的影子。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武汉人而言，家里若有稀客到来，去四季美请客人吃上一顿汤包，那肯定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每年端午节前，买一包汪玉霞的时令糕点，作为礼品馈赠亲友，也是常有的事。那时候，照相是生活中极具仪式感的事情，朋友重逢、家



苏恒泰生产的油纸伞



20世纪20年代末的亨达利钟表行

人团聚、结婚志庆、小孩满月或周岁纪念等人生重要时刻，都少不了要上照相馆，汉口的“品芳”、武昌的“显真楼”便是首选。品芳、显真楼因此承载着市民满满的回忆，一张张照片犹如过往岁月的留影，编织出一段段温馨时光，激起人们记忆深处的一阵阵涟漪。

在许多市民的心中，老字号岂止是一个个商店、一个个品牌或者一种种技艺？或许更多的是一段段回忆、一缕缕情愫、一桩桩往事、一片片乡愁。

老字号还是我们城市中的鲜活主体，与市民有着亲密的互动交集，是构成我们城市家园不可或缺的“老伙伴”。它们伴随我们一路走来，与我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在高度匿名化与形式化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为

我们留出一片温暖空间，成为城市认同、地域认同的一个文化媒介，它们使我们熟悉城市家园，并深深爱上这个家园。

品读老字号，就是讲述武汉故事

老字号其实就是城市生活中的一员，与我们城市一路同行。城市孕育滋养了老字号，老字号也见证了城市的风雨沧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品读武汉老字号、讲述老字号的故事，其实就是讲述武汉的城市故事。通过老字号的创业发展、兴衰起落，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领略汉口市场之大、商业之盛，真切感受这个商业都会的往日风采。

品读武汉老字号，我们会发现，老字号的成长与武汉城市的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武汉老字号发展的“黄金期”就是近代武汉商业发展的“高光时刻”，两者完全叠合在一起。

看看叶开泰、汪玉霞的成长过程吧，18、19世纪是它们创业发展的黄金期，叶开泰、汪玉霞、老大兴园、苏恒泰、曹祥泰等老字号的创业发展都在这一时期。

譬如叶开泰，创业于明末清初的17世纪，积累发展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已



大中华酒楼的菜单

颇具规模，驰名海内，成为全国四大中药店之一

再如汪玉霞，其创业发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只是一个以卖安徽茶叶、糕点为主的小杂货铺，19世纪中叶发展成以生产销售自家糕点为主的食物专营店，并在汉口开出多家分号（雨记、为记），20世纪初发展到鼎盛，成为食品业的翘楚。

苏恒泰、曹祥泰、显真楼、周恒顺等也是如此。

为什么18、19世纪是武汉老字号创业发展的黄金期？因为这一时期正是汉口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汉口是饮誉海内的“天下四聚”之一，是“比里昂、马赛还大的商业港口”（美国学者罗威廉的说法），是当时中国的“巨大都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说法），是被人们冠以“东方芝加哥”美誉的商业重镇。正是汉口这一“巨大都市”所具有的商业环境，为叶开泰、汪玉霞、苏恒泰、曹祥泰、周恒顺等的创业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和成长空间。

再看看武汉老字号的市场影响吧，也带有鲜明的“武汉烙印”。它们中有相当部

分是享誉全国的，或者说与全国市场发生紧密联系，其影响往往不以一城一地为限，而是辐射全国的。叶开泰、马应龙、苏恒泰、周恒顺等都是这样。这种状况正好反映了汉口在全国市场的角色与地位。

武汉老字号中有许多是全国著名商号的分号：荣宝斋（总号在北京）、东来顺（总号在北京）、盛锡福（总号在天津）、亨达利（总号在上海）、冠生园（总号在广州）、五芳斋（总号在杭州）、谦祥益（衡记，总号在北京）等，均属此类。这种情形展现了武汉的市场中心地位，但凡是面向全国的大商号、大品牌，若要扩大影响，必定要在汉口开设分号。何故？汉口是内地市场中心，不占据汉口，何以进图天下？于是乎，纷纷在汉口设立分号，遂成为近代武汉商业的一段精彩叙事。

还有一点，从老字号经营主体的地域构成上看，很多都是客籍（久居汉口的外地商人）所创办，这反映了近代汉口五方杂处、客旅居多的社会结构特征。徽商、浙商、赣商、楚商（湖南）、晋商是构成武汉老字号的主流，其中尤以徽商、浙商居多。由此引出了“徽商在汉口”“浙商在汉口”等一系列城市故事。

徽商在汉口的经营时间很早，为数颇多，只是许多事迹早已湮没，难知其详。我们熟知的老字号汪玉霞、叶开泰就是徽商所办。在清代早中期，汉口是全国最大的米谷转运中心，汉正街上很多大的粮食行都是徽商所办。还有匹头号（布匹批发）也多由徽州人经营。旧时汉正街上有紫阳书院，那是徽商在汉口的会馆。徽商在汉口实力雄厚，声势很大，谈到这一点，身为徽州



高洪太的响器产品

人的胡适先生很是骄傲，他曾说“汉口的繁荣是我们徽州人创造的”，语带夸张，却近乎实情。

苏恒泰纸伞店、福庆和米粉店均系湖南人创办。明清以来，湖南、湖北俱属湖广，两湖毗连，湖南商人在汉口经营者多不胜数。湖南的稻米、桐油、竹木都是行销汉口市场的大宗商品。汉口有名的宝庆码头就是湖南商帮的专用码头，其地位与影响可见一斑。

有清一代，汉口是内地最大的中转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作为上等衣料的绸缎多来自江浙一带，一些大绸缎号、绸布庄多由浙江人开办，诸如悦新昌、鸿彰永、大成、恒昌等。浙商（又称宁绍商帮）也在汉口留下了很深的印迹。

浙商长袖善舞，早年间做淮盐贸易，生意也很大。汉口是淮盐行销两湖的中转码头（两湖总盐岸），引得众多商家在此居间逐利，财大气粗的盐行中，浙商为数甚众。今天汉正街中还有淮盐巷，青砖瓦房虽已残破，一砖一瓦犹见当年的考究与奢华。浙商还是金号典当业的行家，老凤祥、老天宝、老宝成即为浙商开设。浙商人多财丰，在汉口形成一个为数庞大的社会群落，江浙饮食、吴越风味在汉口有相当的市场，五芳斋便应运而生。它的汤圆及各种甜食不仅满足了浙商舌尖上的乡情，也深得汉口本地人的喜爱。

还有赣商、晋商也在汉口经营贸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像著名的邹协和金号、邹紫光阁毛笔店就是赣商所创办，武昌有名的中药店刘有余堂则系晋商创办。众多老字号多由客籍商帮经营，显示出汉口市场高度开放的特色，更体现了它作为移民城市所具有的多元文化风貌。

保护老字号，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保护老字号已成为当下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如前所述，老字号是城市生活记忆的鲜活载体，它们与市民有着频繁而亲密的交集，承载着人们对自己城市的生活记忆与家园情怀。它们因此成为城市的一种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有必要有责任对它们倍加珍视，大力保护。

在我看来，老字号既是一种“活态”的实体存在，更多或许是一种文化记忆，因此对老字号的保护，就要兼顾经营实体与文化资源两个方面。既要保护作为经营实体的“活态”的老字号，在税收政策、金融信贷、市场环境、品牌保护等方面予以支持；又要保护作为城市文化资源的老字号，对它们的历史沿革、传承发展、家族谱系、品牌价值、



品芳照相馆旧照



20世纪80年代的波衣也乐队

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挖掘、系统整理。

所以说，保护老字号，其意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它不是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改善一些老字号企业的经营状况，或者仅仅是增强一些老字号的市场适应力，也不仅仅是振兴某些传统工商业门类、某些传统技艺等，而是要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通过保护老字号的文化资源，达到保护、传承并发扬城市文化精神的目的。再进一步讲，通过挖掘整理老字号的文化资源，不断拓展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增进市民的城市认同感，涵养乡土情感与家国情怀，不断提升城市的文明水平，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这是我们保护老字号的最终目的。

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

首先，要树立文化保护的全新理念，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去看待保护老字号的目的与意义，全面思考、系统谋划这一问题。始终围绕“历史文化资源”这根主线，做好城市文化保护这篇大文章。

其次，要把保护的视野从“活态”的老字号实体拓展到各种作为文化形态的老

字号，将“活态”的老字号与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老字号结合起来，把现实的与历史上存在过的老字号都纳入城市文化保护的工程中，进行通盘考量。

通过田野考察与文献搜索方式摸清武汉老字号的家底，继而搜集整理武汉老字号的各类文献资料与口述资料，并将其纳入“城市文化记忆”工程。全面实施老字号“非遗”项目、传统技艺、家族谱系、品牌文化、企业精神、民间传说的系统挖掘整理，规划建设一批“老字号‘非遗’技艺工作室”“老字号博物馆”“老字号民俗文化馆”等设施，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社会场景保存老字号的文化基因，展示并传播老字号的文化魅力。

另外，要以城市文旅融合发展为契机，把保护老字号与武汉历史文化名城的打造、历史街区的修复、历史文化景观的营造结合起来，整体规划，整合发展。让老字号的品牌店扎根在城市文旅景区，把老字号作为文化元素融入武汉的各种历史街区与旅游景区，使武汉的文旅产业更具地域性与历史感，全面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的独有魅力和商业重镇的深厚底蕴。

保护老字号，说到底就是保留我们的城市记忆，保留我们对老武汉的记忆。回首过往，怀想曾经拥有的那些温馨时光，才能激起我们对城市家园的深深眷恋，才能唤起我们对乡土的深情守望。这便是荡漾在我们心中的浓浓乡愁，有了这份乡愁，我们的家园才会充满暖意与诗意，我们城市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

周德钧，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情注这方红土地——董必武与黄石

◇ 朱俊峰

黄石是一方红色的土地，有 30 多万英雄儿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众多革命遗址遗迹中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 3 处。黄石这片红色的热土，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深情的关心、关注和关爱。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董必武，长期关注黄石这方红土地，情系黄石地区（大冶、阳新）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黄石人民心中永远铭记着他。

播火种，育英才，红色土地薪火传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

共产党组织创建方面功勋卓著。他一手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还在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女师等校兼课，培育了大量英才和革命干部。当时，经董必武亲自培养的黄石地区革命青年有曹壮父、徐策、曹大骏、曹臻璋、曹振华、冯雪涛、皮象休等。这些青年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并作为革命火种回到黄石地区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朽贡献。

曹壮父，大冶市大箕铺镇曹家垸（原属阳新，现属大冶）人，1913 年来到武昌就读于中华大学预科，受到董必武的教诲和革命思想影响。根据董老的指导，他在南京读大学期间，利用暑期回到家乡成立阳新

早期的革命组织“龙山文化促进社”“除毒会”“妇女天足会”“青年促进会”等。他还是南京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南京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党的“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特派他到当阳发动“瓦仓起义”。1928年底，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长。1929年春节前夕，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曹壮父等20余人遭逮捕，英勇就义。

徐策，大冶市大箕铺镇八流村人，1922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受到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董必武的教诲熏陶，立志投身革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1928年8月，任中共大冶县委第一任书记，参加被中共中央称誉的“模范的大冶兵暴”。1930年6月，任红八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1933年5月，任红六师政委。1935年7月上旬，任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和中共川滇黔特委书记。同年，在蒋介石

组织的三省军阀“会剿”中，不幸被滇军残酷杀害。

曹大骏，湖北阳新人，1923年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接受董老的教育和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夏组建阳新县中共刘宣垆支部和该县第一个秘密农民协会。1926年7月，他筹建中共阳新县委，任县委组织部长，后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0年4月，任鄂豫皖边特委执行委员。1931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任红二十七军供给处政治委员。不久，在安徽桐城一次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

在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民运部长，并负责湖北地区党的恢复、重建工作，又为黄石地区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如郭亮、胡特庸、陈力群、吴子义、张榕等人，后来均成为中共大冶县委、大冶中心县委成员，为黄石地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中共湖北地区重要成员的董必武，多次选派优秀人才来黄石开展工作，指导革命。1924年后，许建人、许之桢、马冬阳、覃济川等先后来到黄石，组建了中共大冶港窑湖特别支部，恢复和重建了黄石地区各厂矿支部和群团组织。1926年7月，大冶籍青年知识分子、共产党员许建人回大冶，筹建中共大冶县特支和国民党大冶县党部。不久，又派刘季良为中共



董必武视察大冶铁矿

湖北地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赴大冶，帮助建国共两党大冶县组织。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董必武又派其原湖北一师学生、共产党员李良才等来黄石，参与组建中共黄石港地委，并担任第一任组织部长。

策反攻，克顽敌，赤诚浇灌革命花

1927年初，阳新工农革命进入高潮，党领导工农打土豪、除劣绅，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以旧商会会长朱仲炘为首的阳新国民党右翼势力，在蒋介石反共气焰日趋嚣张的驱使下，经过多次密谋策划，于2月26日深夜召集百余名匪徒举行黑会，27日晨兵分三路向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发动突然袭击。暴徒将省农协的特派员成子英、县农民协会秘书长谭民治、区农民协会会长王得水等阳新县9名共产党员及革命工农杀害。这就是著名的阳新“二·二七”惨案。

当时，虽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加紧反革命政变活动，但我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武汉国民政府中仍占优势。在武汉的毛泽东、董必武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宋庆龄得知“阳新惨案”后，立即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烧死九个人的事件，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较量，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援助阳新人民。

3月2日，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紧急会议，就“二·二七”惨案作出“紧急办法”和“根本办法”两项决议。会议还通过由董必武牵头，邓初民、

孔文轩、郝绳祖起草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后经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讨论批准，为阳新人民镇压反革命、惩治土豪劣绅提供了法律保证。

3月6日黄昏，董必武指派由省政务委员会特派员王慧文、省党部工人部长王延墉、省济难会代表蒋宗文组成“阳新惨案”查办小组，并率省警卫1团1个连的武装，到达阳新查办该案。他对王慧文说：“阳新县党部和农会把庙里的菩萨打了，反动分子就把我们的九位同志烧死了。”“省党部决定对阳新惨案的反动分子必须进行镇压，并决定要你去，学校的事务你可以先放一下。”但因打击力度不够大，致使重要人犯逍遥法外，首次查处草草收场，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着阳新。



董必武和黄石干部群众在挹江亭前合影

敌人在阳新的反革命罪行再次报告到中共湖北省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都感到异常气愤，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支援阳新人民，坚决镇压反革命。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阳新惨案处理决议案》，决定指派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3人为委员，与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湖北省农民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再次处理阳新惨案。3月20日，省农协、农代会在武昌阅马场举行阳新、天门、沔阳三县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声援三县人民，董必武到会讲话。3月31日，毛泽东、吴玉章、邓演达指令中央农民部特派专员黄书亮，省农协代表蔡以忱及北伐军11军叶挺师所属的两个连，再赴阳新查办，逮捕凶犯20余人。4月6日，查办委员会开庭审理，宣判匪首朱仲炘等7人死刑，其他从犯皆判处年数不等有期徒刑。

英勇的阳新人民在镇反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鼓舞下，以更加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工农运动，乡村的农协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并迅猛发展壮大起来。据1927年5月《湖北农民》记载，此时阳新县的农民协会会员达29万，居全省之首。

抓建设，促生产，情系江南新钢城

黄石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1950年8月建市，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最早设立的两个省辖市之一，是华中地区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也是近代中国民



收藏于黄石图书馆的董必武晚年工作照片

族工业的摇篮。黄石的建设发展，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重视，毛泽东主席曾经两次视察黄石，董必武也来到这座江南新钢城，给予了这座新兴城市极大的关爱。

1960年10月18日下午3时，74岁高龄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及夫人何莲芝，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陪同下，由黄冈乘船抵黄石。

董老首先视察了大冶钢厂一炼钢厂、二炼钢厂等车间，大冶钢厂党委书记李振江、厂长江敏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下午5时，董老在海观山宾馆听取黄石市委汇报，赞扬了黄石发展快、成绩大。随后，参观黄石小型工业品展览。晚上，董老一行还参加了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的干部群众文艺演出。

10月19日上午8时，董老视察华新水泥厂，向厂党委书记李秉范仔细询问细磨、烧成等车间的生产流程，并对华新在大窑窑头安装水泥吸尘器十分满意，称赞这是改善市区卫生环境，提高水泥产量的大好事。

9时，董老来到大冶冶炼厂（现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向该厂党委书记赵宽铭、厂长王克让和干部群众了解生产经营情况。

10时，董老一行视察大冶铁矿，在矿党委书记陈明江陪同下，登上尖山，视察采矿，观看选矿厂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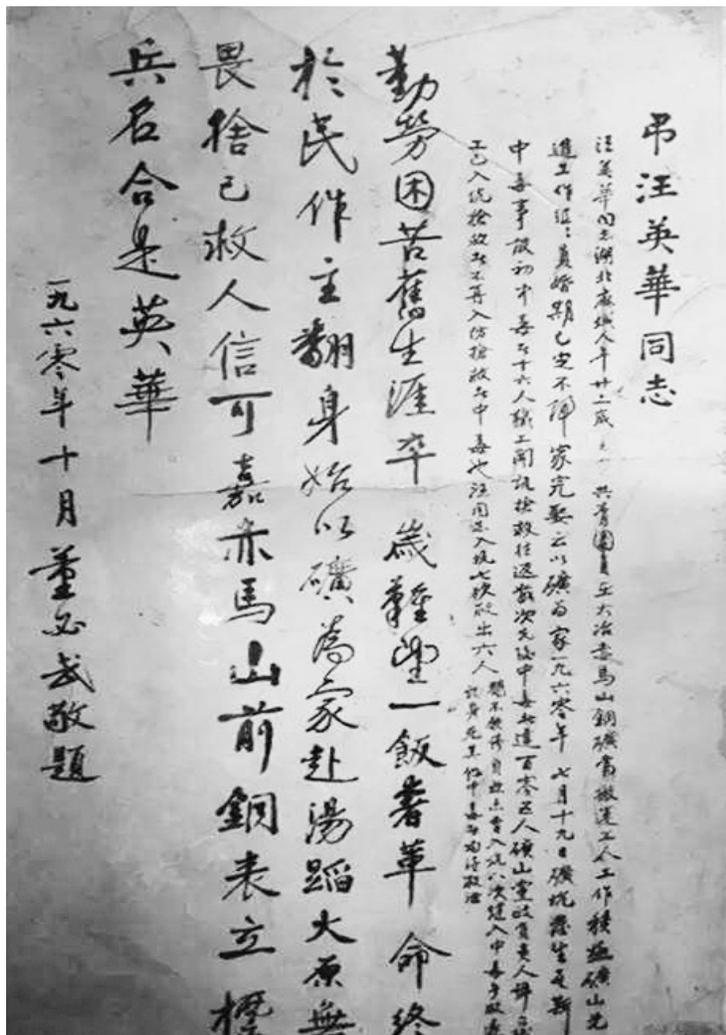
据原大冶铁矿采矿车间主任张松堂回忆，他当时在尖山120米水平处铺设电力机车路轨，清楚地看到董老从汽车走出来，手拿拐棍，身穿大衣，脚踏一双黑布鞋走过来。董老踩着崎岖不平乱石遍野的掌子面，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问，再三叮嘱大家，在暂时困难时期，既要搞好安全生产，又要切实安排好矿工的生活。

在选矿车间，他上铁梯不要人扶。在观看大冶铁矿“大办钢铁”建造的“小高炉”时，他指示说：还是要专心搞好矿业开发，不要分散精力为好。随后，大冶铁矿把“小高炉”拆掉，建成露天仓库。张松堂激动地说，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我们敬爱的董老在视察大冶铁矿时，充分肯定了矿山职工的忘我献身精神和主人翁责任感。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这个开采迄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中国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最高年产矿量500余万吨，被誉为“武钢粮仓”，为我国钢铁工业和武钢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题赞诗，留墨宝，长者风范难忘怀

无情未必真豪杰，多情亦是大丈夫。董老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胸怀天下苍生的诗人书家。视察黄石期



董必武为汪英华题诗手迹

间，他为一位普通的矿工书写赞美诗篇，并在当地留下墨宝。

1960年10月18日，董老在听取黄石市委工作汇报时，听说了大冶冶炼厂石赤马山铜矿工人汪英华为抢救工人兄弟而英勇献身的事迹。19日，在视察大冶冶炼厂时，他又向冶炼厂负责人详细询问了汪英华的身世和平时表现。董老听得很入神。20日，董老在武昌亲笔题诗，赞美赤马山铜矿工人汪英华，并题小序。全文如下：

咏汪英华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日夜枕上口占
汪英华同志，湖北麻城人，贫农，年

挹江亭

董必武
一九六零
年十月

董必武为黄石市题写“挹江亭”

二十二岁，共青团员，在大冶赤马山铜矿当搬运工人，工作积极，矿山先进工作组组员。婚期已定，不归家完娶，云以矿为家。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九日矿坑发生瓦斯中毒事故，初中毒者十六人，职工闻讯抢救，往返数次，先后中毒者达百零五人。矿山党政负责人号召：职工入坑抢救都不再入，防抢救者中毒也。汪同志入坑六次，救出五人，犹不愿停，自称未曾入坑，七次继入，中毒无救，遂致身死。其他中毒者均得救活。

勤劳困苦旧生涯，卒岁难望一饭奢。
革命终于民作主，翻身始以矿为家。
赴汤蹈火原无畏，舍己救人信可嘉。
赤马山前铜表立，标兵名合是英华。

董老在视察黄石期间，入住海观山宾馆。该宾馆临江而建，风景优美。董老在海观山宾馆主楼会见黄石市部委以上及各大厂矿主要负责人、市县劳动模范，并和大家在“临江楼”左侧的亭子前合影，并为亭子题写“挹江亭”“望江亭”“阅江亭”三幅字。黄石市选“挹江亭”为亭名，该处遂成为黄石胜景“挹江听涛”。

此外，董老题诗称赞阳新九位女英雄的事情鲜为人知。1852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攻克阳新后，阳新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纷纷拿起武器，踊跃参军参战，组建成立“兴国军”，成为太平军中的一支劲旅。1856年太平军进攻武昌，流传“兴国军包

打洪山”的佳话。位于武昌东湖西北湖畔的“九女墩”，就是为纪念当年兴国军在包打洪山时壮烈牺牲的9个女兵建造的，而这9个女兵都是阳新沙村人。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纪念这9位无名英雄，应乡人之请于1952年培修陵墓，并在陵墓周围修筑瞻仰坪约70平方米，坪台上建纪念碑1座。碑以石块砌成，顶部悬有铜铃，正面镌刻董必武撰写的《九女墩记》，碑阴和两侧刻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张难先等人题词。董必武在诗中称赞九女“自求解放入天军，巾帼英雄著义声，群众最怜英雄女，口碑传出足千秋”。九女墩的四周，遍植花树，葱笼茂密，庄严肃穆。1956年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朱俊峰，黄石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汉口“梁记药房”探访

◇ 韩少斌

今年2月，武汉文保志愿者团队“人文武汉”公众号主编田联申，在微信群发出一张标为汉口法租界的街景明信片（图一），提请大家寻访以确认具体所在，钩沉一段老租界的史实，引起关注。

明信片所呈现的景物建筑，由于岁月变迁，可供参照的元素不多，一时难以作



图一：左侧（街南）为梁记药房，右前（街北）为涂瀛洲公馆

出判断。于是笔者与研究老照片颇有功底的孙庆力，“煲微信电话”讨论起来。根据明信片上的模糊远景，初步推认它是在教会街（今蔡锷路）与吕钦使街（今洞庭街）交汇处，向江边方向拍摄的。

3月28日，孙庆力找到了一张与之角度相反的老照片，随后，我们穷尽各自所掌握的图片资源，又找到两张街道两侧相关联的建筑（图二、图三）老图片。可以肯定的是，影像确实存在于老租界，但仍不能判定其具体位置。收藏家袁厚翔参与进来讨论，通过对阳光照射角度的分析，又推翻了原来教会街的猜测。

一切归于起点，但又不同于原点，可参照的元素多了，提供了查找的方向。图二中有文字介绍，翻译为“中央药房”。可是汉口的中央药房不止一处，且年代不一，地址涉及宽泛并相互矛盾，不具参考价值。但



图二：梁记药房



图三：梁记药房对面的涂瀛洲公馆

图中建筑的中文店名“梁记药房”，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

3月29日，笔者继续查找相关资料，终于在《汉口租界志》找到“梁记大药房”位于法租界河内街的记载。根据《武汉文博》2016年第二期章辉文章对法租界地名的考证，河内街后改名为大法总理克勒满沙街，1943年与玛领事街合并为庆平路，1946年又与博爱路合并为车站路。于是，在电脑中打开百度街景，对着今车站路中段比对环境、街形、角度。刚越过法国圣母堂街景不久，一幢似曾相识的三层小楼出现在屏幕中，地址是现车站路17号（图四）。

“是它！”随着三人一致的比对结论，一切都吻合起来。虽然小楼屋顶已改为坡顶，外观也有所变化，但房屋内凹的大门门楼、窗户、门厅侧窗台、地下室出气孔等细节相符。

一切豁然开朗。有了具体方位，再找相关的佐证就顺利多了。图三左侧的建筑，也与路口的太平洋商会旧址对上。1917年《汉口外国租界街道图》中，F18地块“中央药房”的标识也不违和了。1915年左右在巴公房子上拍摄的全景照片长卷中，也看到了它的身影。当我们还沉浸于兴奋之中，孙庆力又敏锐发现马路对面的涂瀛洲公馆，就是图三右侧的建筑，虽然其尖顶和左侧的部分建筑已不存。

终于找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梁记药房旧址。

梁记药房在《汉口租界志》中是这样介绍的：建立于“1908年前后。经营药业，调制配方，且自制西药，同时从欧洲进口各种化学药品、药材、香料、盥洗用具、肥皂、杂物等。药房雇有药剂师，储存有葡萄酒和烈性酒，还为旅游爱好者备有照相器材和风景明信片出售。1910年为皮卡(Picca)收购”。

有关梁记药房的明信片，对于“人文武汉”的师友和武汉老照片的爱好者来说，



图四：梁记药房现状

并不陌生。就我们所知，标为 Ch.Bernard. Pharmacie .Centrale .Hankow 的明信片不下数十张。这些明信片不仅有鸿阁楼、东岳庙等远去的影像，更多展现一些晚清百姓市井生活的画面，为我们了解百年前的武汉社会风情提供了宝贵史料。

据我们研究了解，梁记药房的建立者是查尔斯·伯纳德，一位比利时化学家，喜爱摄影。其朋友斯普鲁伊特医生，也在武汉拍摄了大量的作品，成为武汉晚清历史研究的一座宝藏。



梁记药房的建立者查尔斯·伯纳德

4月1日，笔者与孙庆力、袁厚翔来到了梁记药房旧址探究，通过老照片现场比对建筑特征，询问老居户深入了解情况。从小就生活在这一带的袁厚翔感慨万分，指着梁记药房旧址二楼回忆道，这就是他的小学同学何宁宁1960年代的家。何宁宁的父亲，就是老红军何太阳。袁厚翔笑言他小时对“老”的困惑，因为何太阳在他的印象中并不老，红光满面，气宇轩昂，是一位叱咤风云、战功显赫的战将形象。

何太阳是四川省苍溪县石马镇人，

1921年6月出生，原名何二娃。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红军。入伍红4军12师36团，北上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毛主席亲自为他改名何太阳。他从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曾任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团长、江汉独二旅八团团长、湖北襄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炮兵处主任、炮兵司令部参谋长、武汉市人武部副部长、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雪山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处处有他的热血和汗水，2004年2月24日，老人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84岁。

梁记药房一类老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具象记忆，它作为历史文化的实物例证，承载着武汉厚重的人文积淀。“人文武汉”草根们长年走街穿巷，依靠老地图、老照片和有限的文献资料，为武汉数十座优秀历史建筑的认定，提供了线索和依据；纠正和补充了福来德洋行、吴家花园、民生公司旧址等优秀历史建筑的史料不足；不断发现、挖掘、整理汉口临时保育院、培心善堂、文德三小等历史建筑的前世今生。

“人文武汉”团队活跃在武汉三镇，在保护老建筑、挖掘城市历史、讲好武汉故事方面成绩斐然。历史学家严昌洪教授称赞说：“这个团队人员所写研究文章，没有学术八股，而是把文献检索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把文字史料与实物史料（文物、照片）相结合，写得生动、具体、细腻、深刻。这是有别于学院派学者的，值得好好学习。”

韩少斌，武汉奥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理

汉阳公园发现 1964 年“汉阳树”碑刻

◇ 胡全志 严涛

11月20日，“人文武汉”文史爱好者徐志刚披露：在汉阳公园发现了疑似“汉阳树”的碑刻。次日上午，笔者之一胡全志专程前往汉阳公园，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对碑刻清洗辨认，确认此碑刻专为园内一棵约200年树龄（当年实际树龄为97年）的国槐所立，名为“汉阳树”。

说起“汉阳树”，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联想市五医院旁的那棵银杏。今年5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征集汉阳树公园概念设计方案，拟建汉阳树公园。

专为一棵树建造一座公园，武汉也是首开先河。然而，这棵银杏树并非唯一的“汉阳树”。“汉阳树”的概念，也并非哪一棵指定的树所能涵盖，它是一代又一代汉阳人地域情怀与集体自豪感的精神寄托与文化追求。

银杏树修建小庭园

1984年前，汉阳古银杏树被四周民房团团包围，“养在深闺人不识”。1979年和1983年，市园林部门先后两次进行古树名木调查，全市中心城区被记录的古树仅有21棵。

据《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1979年、1983年古树名木情况调查表”记载：银杏，估计树龄700年，高度21米、胸径137厘米、冠幅28米，树龄排名第一。由此，1984年修建了“汉阳树”小庭园。百度百科“汉阳树”词条介绍：为了保护这株古树，汉阳区园林局向市政府呈交报告，申请20万元经费拆迁民房，并首次将这株古银杏称作“汉阳树’。”此资料出处未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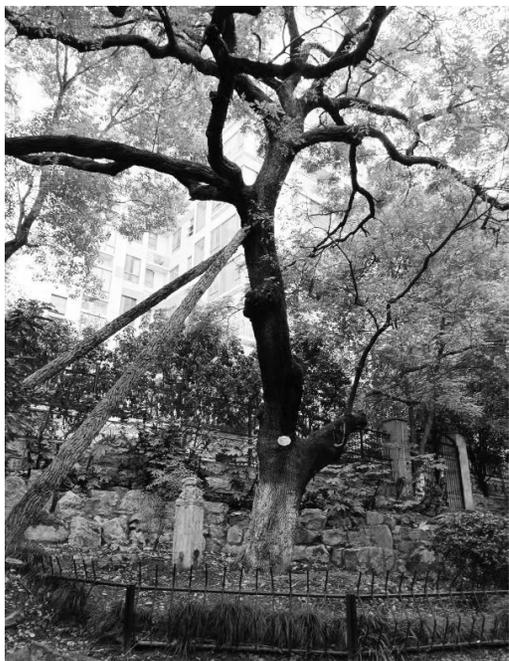
2021年12月9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与一棵树相守540年，武汉人的超级接力》一文说：“1985年，汉阳园林局在凤栖山脚下发现这棵古树，将它取名为‘汉阳树’。”

“汉阳树”国槐有碑为证

银杏被称为“汉阳树”在1984或1985年，比它取名更早、有文字可考的“汉阳树”，却是汉阳公园一隅的一棵国槐。这棵国槐冠名时间是1964年，比那棵银杏早了20年。

知其树是古树者不少，而知其名为“汉阳树”者不多。58年来，汉阳公园工作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游客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对这一棵“汉阳树”鲜有所闻。走访、电访10余位附近八旬以上老人，均称“不晓得”。

这棵国槐位于汉阳公园著名的人文景观石榴花塔旁边，树高13米，胸径192厘米，



汉阳公园的国槐及“汉阳树”碑刻 胡全志供图

树身已倾斜，安有两根支撑架。一方“汉阳树”石柱碑刻就立在树下。从石柱的外观来看，是利用古建筑中的石栏板立柱改刻的。立柱的下方有榫卯接口孔洞，用水泥抹平，柱头上雕有一小狮。石柱材质为石灰岩，遍布杂纹，从风雨侵蚀程度上看，应是明清之物。柱身26×29厘米见方，露出地面高80厘米，石狮高35厘米。正面竖书“汉阳树”三个双勾大字，每字约14×19厘米大小，潇洒飘逸。石柱右侧竖刻7行碑文，每行满刻（含标点）12字，每字约3厘米大小，行楷书法。

笔者之一胡全志对碑文大致解读后，意识到这方碑刻的史料价值，当即向公园管理处主任梅复传介绍情况，建议像对待文物一样进行保护，同时，对园内其他散落古石刻也进行搜索整理，开展历史文化挖掘，丰富公园文化内涵。

无独有偶，笔者之一、武汉碑刻传拓家严涛，早在2005年夏天，就将园内散存的古碑刻拓了下来，包括这方石刻。对照2005年的碑拓照片，合力核实了碑文。碑刻全文为：

汉阳树见于唐代崔灏：晴川历历汉阳树一诗。但解放前，汉阳荒秃不堪，草木凋悴；今则佳木葱茏，留此二百余年的古槐树，对比之下，极有教育意义。

一九六四年元月

文中，崔灏两字间有空格，“灏”写作“灏”。

这块碑刻记录了称国槐为“汉阳树”的原由，文字通俗易懂，具有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改革开放，武汉所见新镌碑刻较为有限，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稀有。著名的碑刻有1957年5月汉阳“琴台简介”纪事碑、“武汉长

江大桥建桥记”、长江大桥首任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题写的“蛇山头”“黄鹤楼故址”题刻，还有滨江抗洪纪念碑碑刻等。而为古树题刻的纪事碑目前寥若晨星，或仅此一处，这也决定了其史料和文物保护价值。

百年古槐的来历

据《汉阳区志》（2008年）和《城市建设志》等记载，汉阳公园所在地在元代末曾是农民起义红巾军领袖徐寿辉的天完国国都处。康熙年间，汉阳人江蘩在外做官告归故里，居凤栖山（今凤凰山），在山南和山北各筑一私园，山北之园为江园，即今汉阳公园所辖之地。道光年间为同善堂堂址，院内有明代文人李渔（号笠翁）的“灵芝峰”假山石。民国初，此处又建为春茂花园。

汉阳公园始建于1956年，利用旧料建成，1957年对外开放。1964年（应为1963年底），将添福巷内的“石榴花塔”移到园内复原。正是同年同月，公园在请人题写、镌刻石榴花塔“迁移小志”时，为这棵老

国槐树刻下这方碑，以作时代记录。由此可见，生长在汉阳土地上的古树，被视作“汉阳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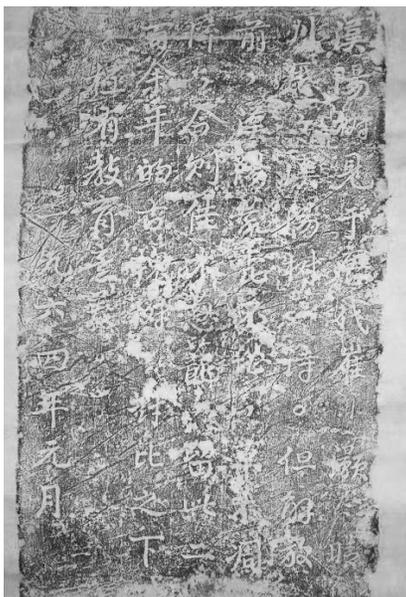
2005年，严涛去公园拓散存的古碑刻时，见到一截清代石榴花塔上半部残碑上有“石”字。2013年，又见一截残碑上有“榴花”二字。碑文所刻文字，与志书记载一一吻合。此外，还有清同治汉阳府谕示碑、清泉船帮碑以及建筑构件、石栏等。“汉阳树”石刻就是典型的就地取材。

从1964年至1990年，这棵“汉阳树”很少有人提及。《园林畅想曲》（1990年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作者余开来在“晴川历历汉阳树”一文中提到：“汉阳公园永丰堤畔有一株100年以上的古槐树，经过培育，返老还童，青青馥馥。”这棵树，就是当年被称为“汉阳树”的古槐，因为汉阳地区共20棵古树名木中，只有一棵是国槐，独一无二。

在汉阳区园林局查阅到2005年制作的“武汉城区古树名木档案表”，所附表三中记载了这株国槐，编号20114：胸径61厘米；

树高13米；冠幅16米；确认时间为1983年；树龄约137年。

2009年5月，这棵树上挂了一块绿色的保护牌。国槐为二级保护，树龄约160年。2004年11月，武汉市公布第一批二级保护古树名木目录，这棵国槐名列其中。此树到今年实有155年树龄。1964年碑刻上写作“二百余年”、2009年挂牌“约160年”，均为误判。市园林局1979年、1983年



2005年“汉阳树”题刻及碑文拓片 严涛供图

古树名木情况调查表中，汉阳树（银杏）“估计树龄 700 年”，同样也是误判，原因不言自明。

“汉阳树”冠名初探

唐代诗人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千古名句，造就了明代“晴川阁”的诞生。1200 年后，由此产生了第一棵“汉阳树”。

何谓汉阳树？历来众说纷纭，各路学者纷纷以自己的见解试图揭开这一千古之谜。有人说，崔颢隔江远眺的汉阳树，可能是“禹柏”；有人说，是指汉阳鹦鹉洲对岸江边的那一大排柳树。唐、宋、元、明、清，历代诗人在其诗中出现“汉阳树”者，不下几十首，但都未实指哪棵树。宋有曹勋：“汉阳树远江烟起，黄鹤楼空燕子归。”元有刘崧：“至今汉阳树，飞度隔江云。”明有何乔新：“我曾凌风登此楼，但见苍茫汉阳树。”孙蕢（fé n）：“汉阳树白烟景湿，行人如鸥沙际立。”清有胡醇：“濛濛烟霭中，望见汉阳树。”沈梧：“汉阳树色人家尽，白下江声战垒孤。”从上述古诗描写的场景来看，汉阳树应指：地处汉阳江（洲）边水陆交通要道一带高大壮观的一群（排）树。

汉阳历代地方志中，也未见有具体的汉阳树之指代。史上首次将具体的一棵树称为汉阳树者，就是汉阳公园这棵百年国槐。当年为何、是什么人要将这棵树取名“汉阳树”呢？根据有限口碑结合推理判断，条分缕析大致情形。

这棵槐树问世于 1867 年（清同治六年）左右。汉阳公园前身为私家花园，此树为庭院树，从所处位置（院墙边）判断，始终未移动。

余开来在《园林畅想曲》中提到：“汉阳公园 1964 年在西侧土坡上修建地下防空洞工程时，曾出土大量元明时代的大块青砖，证明过去这里曾有一些类似宫殿式的建筑群。”

2005 年，严涛和友人宗晓斌去公园拓碑时，曾见过诸多建筑遗物构件。“汉阳树”碑刻与这些古建材及石榴花塔迁移关系密切。《武汉名胜散记》（余开来著，1987 年 1 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江城宝塔各千秋”中记道：“一九六四年，为了保护名胜古迹，汉阳区人民政府根据部分人民代表意见，将石榴花塔移入汉阳公园西侧，永丰堤畔土坡上。”

这段文字透露出石榴花塔迁移至汉阳公园是人民（或是人大）代表的意见，也与“汉阳树”碑刻同期进行，可推导出如下判断：

一、“汉阳树”碑刻是 1964 年利用石榴花塔刻碑工程所请书法家、石刻工“顺水推舟”所为。经仔细比对，石榴花塔“迁移小志”与“汉阳树”碑刻书法、刻工分别出自同一人之手。其中“汉阳”“见”“古”“一九六四年元”等字，笔法如出一辙。



1964 年元旦汉阳公园所刻石榴花塔“迁移小志”碑刻 胡全志供图

二、“汉阳树”的冠名及碑刻皆与汉阳公园有直接关系。当时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财政经费吃紧，碑刻是在旧石柱上所刻，节省费用。个人以及外界团体立碑的可能性可直接排除，在公园擅自立碑也是不允许的。

三、碑文为公园所拟。当时因被认为是“二百余年”古树，在汉阳地区较为罕见，园林业内人士出于“教育意义”为树命名。业外人士对古树树龄则知之甚少。

两棵“汉阳树”连枝守望

十几年来，凤凰巷古银杏称作为“汉阳树”已广为人知，在此情形下，汉阳公园的国槐如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如何给国槐一个体面的身份，考验多方智慧。石榴花塔的故事，被称为“汉版窦娥冤”，国槐石刻也不应埋没不语。江城故事，不可缺代。

或许有人担忧，目前正在规划建设汉阳树公园，这棵汉阳树的发现和披露，会不会抢了银杏树的风头。

其实，这种担忧实无必要。国槐曾被命名为“汉阳树”这一客观事实的披露，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改写园林志，可将此事记录在案以存史料；二是首次尝试为古树名木大胆命名为有指向性的“汉阳树”；三是转变人们以为“汉阳树”是特指某一棵树的习惯思维方式，汉阳古树均可泛指“汉阳树”；四是1960年代碑刻作品的珍贵遗存，具有文物价值。

到目前为止，给树木命名，一直都是民间行为，以传说为由，如“禹柏”“岳松”“岳柏”“婆婆树”“姑嫂树”等。地方政府从来没有给某棵树进行过命名。在官方公布的古树名木保护目录中，“银杏”是其法定名称。在没有制定相关法规的前提下，机关单

位、个人，可以给树命名，只是结果要被大众普遍接受，约定俗成认同度高。譬如“江城”，并非武汉天下独尊，重庆、泸州、宜宾、芜湖、吉林均信手拈来以作别称，取其相同特征而已。

汉阳树公园建成后，二园毗邻，同为“汉”字公园；二树齐名，同为“汉阳树”。此乃天作之合，好事成双，风姿各异，相得益彰。游客前来观赏古银杏时，顺道观赏古园国槐、石榴花塔等景观，岂非快哉？

这方碑刻的发现，至少告诉人们一个实事，“汉阳树”其实不止是一棵树，而是代代相传、守望相助的乡土树。汉阳不能仅仅只聚焦一棵汉阳树，辖区现有的20棵列入保护目录的古树，都可视同“汉阳树”，都可立碑纪事传扬。

针对这棵冠名最早的“汉阳树”的立地条件和生存环境，建议汉阳公园根据“一树一策”原则，将坡形土改造成石砌台状，填土、加固、增肥，防止倾倒；同时对古石柱“汉阳树”碑刻进行景观设计，再造风光。

对现存于公园内有重要史料挖掘价值的古碑刻，应进行全面清理，开展文史研究，并以科学合理的方式陈列展示，促进其城市文化遗产共享。

胡全志，武汉市政府参事；严涛，国网武汉供电公司高级工程师、武汉碑刻传拓家

绿水青山好作伴

◇ 张继

人物名片：张继，市政协委员、民进江汉区工委主委、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在这党团历史的重大节点上，我重拾书本，研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部分专题，学习创新实践的理论结晶，汲取承前启后、开拓新局的精神力量。

整治农村环境尽职尽责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坚定理想信念，必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坚定理

想信念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的事，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无论顺境逆境都坚贞不渝，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出生于农村，长在农民家庭，在从事近五年环境法规工作后，我轮岗到自然生态保护处，近十年在农村环保工作岗位，是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生态振兴的亲历者、践行者。作为一名党外干部，还是非环保专业干部，任职要称职，守土要尽责，首要的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忘合作初心，坚定不移跟党走。同时，要坚持锐意进取，不断增强政策和业务学习，紧跟党中央乡村生态振兴要求，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回忆从事农村环保工作的点点滴滴，一时间找不到自己可圈可点的突出业绩，但



2022年9月，参加市政协城市精细化管理对口协商会

一路走来见证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沧桑变化。环保部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重点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并延伸到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农村农业的方方面面。开展农村环境整治，专业的工程队伍缺乏，资金政策保障有限，部门协调机制不健全，近十年农村环保工作最深的感触就是一个“难”字。

2017年，按照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省住建厅牵头推进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工作，鉴于生态环境部门前期开展了集镇生活污水治理，此项工作交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是全省17个地市州中唯一由环保部门牵头负责地级市。从工作方案起草，谋划和协调项目推进，争取和落实项目奖补政策，到开展项目实施督导，组织季度年度考核，依托第三方进行工程质量监管，我都全程参与，其间各种无力感、挫折感，异常艰辛。

省住建对于乡镇生活污水提出全收集

全处理全覆盖、雨污分流、设施完备体系健全的超高标准。工作开始之初全市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尚停留在试点阶段，诸多集镇仅仅建设处理终端，管网基本零基础，污水收集靠明渠和自然回流，根本谈不上收集率。在领导的精心指导下，我们从建设标准、资金筹集、项目整合、体制机制完善，一步一步砥砺前行，从无到有，从有到全。截至2019年底，全市72个涉农街乡镇污水处理项目全面启动建设，省级考核任务按期完成，终不负韶华不负青春，从“外行”干成“内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从每个行政村治理一个中心湾，到行政村生活污水全覆盖；从逐个行政村治理畜禽养殖污染，到划定三区，禁养区、限养区规模以下养殖全面退出；从治理集镇生活污水，到全市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滴水终于石开，久久日见其功：全市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体系不断完善，农村村庄面貌、农民房前屋后都焕然一新，农业产业绿色发展也逐渐步入正轨。

坚定理想信念，尽职尽责尽心，常修常炼常坚持，不枉度光阴，不虚度时光，幸甚幸甚！

凝聚党派力量参政议政

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专题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在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根本保障，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统一战线是凝聚共同奋斗的重要力量来源。

2021年，我被推选为民进江汉区工委主委，立足团结江汉区会员继承和发扬民进的优良传统，不断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新”“三好”总要求，抓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参政议政，党派力量和作用进一步彰显。

我任职以来，发动骨干会员、新会员积极参与提案议案及课题研究，多次组织召开区工委年度提案原案征集会和课题研讨会，3项课题入选民进武汉市委2022年度参政议政重点调研课题，3项课题入选2022年度参政议政一般调研课题，所有6项课题按期提交。2022年累计提交13篇区政协提案，其中2篇集体提案中《关于加强江汉区湖泊生态治理和养护的建议》被列为区政协领导督办重点提案。

区工委参加了区政协“物业城市”重点课题调研，组织会员参加课题调研并提交《城市管理服务职能社会化运行的风险调研报告》，获重点课题调研组肯定，在区政协常委会进行课题发言。

今年11月，适逢《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在汉召开，习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并发表主题致辞，武汉成为唯一一个人口超千万的“国际湿地城市”，“同湿地融为一体，生态宜居”是对武汉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赞许，我也由衷为武汉湿地保护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更想为武汉生态保护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向市政协提交《关于加强“湖边塘”水产养殖污染防治保护湖泊水环境的建



2022年11月，参与《政协论坛》录制，与主持人及嘉宾合影

议》。缔约方大会召开期间，受市政协邀请，有幸参与武汉电视台《政协论坛》节目录制，面向公众分享大会召开的喜悦，介绍生态环境部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果。我在节目中围绕提案涉及湿地保护有关内容进行阐述，提出落实总书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求，继续做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统筹等建议。

各民主党派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合作共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我作为民进江汉区工委主委、市政协委员，更应团结党派成员、联系界别群众，成为履职的好榜样，当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做好百姓的代言人。

2022年，人生已步入不惑之年，回首过往，感恩身边领导和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和支持，感恩新时代。绿水青山好作伴，双岗建功续新篇。

我走过的万里家访路

◇ 施 婧

人物名片：施婧，江岸区政协委员、民盟汉铁高中支部主委、汉铁高中内地新疆高中班班主任。

我是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的一名班主任和英语教师，也是一名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政协的馥郁书香牵引起我读书的愿望，只有保持阅读才能“昭昭”，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履行好委员的职责。怀着这样的心情，我翻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天行健，吾将自强不息。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勉励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我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致力培养热爱党、热爱祖国，有理想、有担当，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能适应伟大时代的有灵魂的智慧青年。不过，我培养的这群孩子有些特殊。

家访足迹遍及天山南北

我任教的汉铁高中自 2011 年秋季开始承办内地新疆高中班（简称“内高班”），



2016年，赴新疆对地丽胡玛·肉孜进行家访

目前在校学生300多人，分布在高一、高二、高三三个年级八个班，涉及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的四个民族，生源主要来自南疆地区。

自汉铁高中内高班开办起，我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12次赴新疆家访和接送学生，足迹踏遍天山南北所有地州市。

起初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对新疆美景美食的向往，以及想和淳朴可爱、能歌善舞的新疆学生们交朋友，所以一听到有机会成为内高班的老师，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校领导很慎重地和我们沟通了一些具体情况：内高班的孩子们大多家境贫穷，怎样才能让他们不会有后顾之忧？语言问题比较严重，怎样让孩子们能够顺利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较大的文化差异之下，又要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融入武汉的学习生活环境……这些都是我们要一一解决的问题，也让我感到肩上担子无比沉重。

3000公里到达新疆，再辗转5000公里，才能抵达学生们在南疆喀什、和田等比较偏远地区的家。

家访的路上，可以看到美丽的草原，连绵的雪山，蓝天白云下悠闲的牛羊，但也会有更多特殊的时刻：进城镇下农村，翻群山过草原、过沙漠，一路颠簸，一路探访，每天至少都有五六百公里的车程，有时长达十几个小时都在车上度过；新疆很大，大到手机定位和实际地址经常相差20公里以上，所以有时很难找到留宿的旅店；道路复杂难走不能确定抵达时间，好多次都是到了凌晨两三点才能抵达学生的家……但超长距离和奔波疲累都算不得什么，哪怕距离再遥远、旅途再漫长，只要能远远地看到学生的家时，就会发现家长和孩子们早已在路口或门口等着我们，他们会用最热烈的少数民族礼仪欢迎我们，也会用家中最丰富的食物款待我们。

家访是学校与家庭建立联系的桥梁，通过家访可以更好地增进家校情谊，打好配合，保障学生们的健康发展。但很少有人听说过要奔波5000公里的家访吧？我们新疆班的家访，就是需要跨越

位于克州阿克陶县的地丽胡玛·肉孜是我新疆班的学生，她家也和很多新疆班孩子的家庭一样，但也有一些不同。那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阿克陶县最贫困的村子，本来几位老师都有了一些心理预期，觉得小姑娘的家境应该比想象中的还要差一点，因为她家有四个孩子，她是老大，四个孩子读书全靠爸爸一个人支撑。但看到她们家垮塌了半边的房子时，心里还是拧着难受。

那天，地丽胡玛的父母非常开心，端出了烤全羊招待我们，但我吃得很不是滋味，因为这头羊是夫妇俩找邻居借来的，烤馕的馕坑也是借用邻居家的，他们家没有……我们几位老师各自拿出了一些钱，偷偷地塞给了这对夫妇。

从她们家离开，我忍不住想哭，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对地丽胡玛和她的家人承诺：放心吧，新疆的父老乡亲，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培育他们。教他们知识，教他们做人，教他们诚信，教他们感恩，地丽胡玛的学业我会一直资助她，直到她大学毕业！



2019年，带新疆学生坐游轮看长江大桥

小姑娘很棒，不仅考上了211大学，毕业后还考上了老家的公务员，带着知识和眼界建设新疆去了。她的妹妹们在她的影响下，也顺利考上了内初班、内高班和大学，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我也常常看到她朋友圈里的好消息，给她点赞，给她留言。

慈母之心培育新疆学生

古丽帕热·木太力普是我“抢过来”的女儿，在她读预科班时，原本已经有了一位学校安排的代理家长，但是我没办法不去关注她。古丽帕热长得特别漂亮，明亮的大眼睛，圆圆的可爱脸蛋，又能歌善舞，我特别喜欢看这个漂亮小姑娘，但是她身体很弱，刚来学校的时候好几次晕倒在宿舍，这可把我给吓坏了。我们带着古丽帕热四处寻医，就是找不到病因，可孩子晕倒的情况不见好转，这又把我给愁坏了。

找不到好方法，我只能花更多时间来观察古丽帕热，这样每次在她晕倒后，我能第一时间去处理，保证她的安全。意外到来时，我就抱着她，除了怕她摔倒，更想让这个敏感脆弱的小姑娘睁开眼睛之后发现，原来老师一直陪在她身边，一点都不可怕！

古丽帕热没有父母，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性格敏感脆弱，内心要强，却又时常感到自卑，所以我知道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一个温暖的怀抱有多么的重要……

就这样，古丽帕热

被我“抢”了过来，我替代了她原本的代理家长，这样我才能有更多机会去呵护她，而她对我的称呼也从“施老师”变成了“施妈妈”。

后来，这个小姑娘怎么样了？

在多次检查无果之下，学校决定到武汉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重新检查。通过专家会诊，终于找到了病因，并且针对性地治疗。古丽帕热也顺利考上了大学，以前胆小敏感的她，不仅乐观开朗了，还成了学生会干部，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她还是会经常给我发消息，每个消息的开头总是写着：施妈妈……

十一年前，我根本没有想到，因为当年的一些冲动和好奇我成为内高班的老师，一干就是十一年；十一年前，我也没有料到，我的生命里，会拥有那么多“女儿”和“儿子”，虽然我只是他们在武汉的“代理家长”，但我们建立起来的那份感情质朴而真挚，而且会相伴我们一辈子。

从跨越几千公里的家访，到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再到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成长成才，这十一年的旅程虽短，但足以让我回味一生。

2021年，我被推选为江岸区政协委员，这个身份意味着我必须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所联系的群众。在十几年从事民族教育的实践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必须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紧紧围绕



与新疆孩子一起欢度古尔邦节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核心问题，根据内高班的民族教育实际，结合武汉地区的教育特色，通过“体验诚信、感悟责任”、“诚信立身、责任同行”等系列实践活动，在少数民族学生中继续大力推崇诚信教育和感恩教育，培养更多民族团结的促进者和诚实守信的好公民。

细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十专题：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伟大的思想和理论如春风沁人心脾，如曙光照亮前进之路，自感民族教育的思想和理念得以升华，从事民族教育的意志更加坚定，民族教育的未来将更加光明灿烂。

“健康”是人生头等大事

◇ 董林艺（口述） 舒 赢（整理）

人物名片：董林艺，武汉市九江商会首任会长，武汉远光瑞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医疗器械协会副会长，长江职业学院特聘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

1998年，我正式投身大健康事业，如今已有24年。在时光的长河中，24年只是一瞬，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年华。在我心中，“健康”是人生头等大事，也是人生终极目标，健康有质量的活着才有希望，能从事一份给人带来健康的事业，不仅是价值体现，更是福报所为。

不甘做代理

我本科毕业于中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成人自考），早期在林业系统从事林木种苗

的承包经营工作，在1994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公司法》之际，我便乘着时代的东风，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经营林木种苗的企业。一个偶然的机，我在一位朋友家里体验到日本生产的电位治疗仪，体验时感觉对睡眠有非常好的帮助。想起我的母亲睡眠很不好，我就请朋友给母亲买一台电位治疗仪，母亲用后，一直困扰她多年的失眠很快就得到了改善，如是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病痛原来可以通过仪器预防和治愈，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电位治疗仪就是利用现代生物电子医学技术，在作用端产生高压交变电场及高压产生的空气电离子、微电流等物理因子，给予处于绝缘状态人体的全身生理组织和生理系统进行刺激和平衡，改善细胞电位、血液循环、植物神经的功能，以提高人体抗

病能力和自然治愈力，从而达到辅助慢性疾病康复、保健、防病的作用。

电位治疗仪最早的研究运用是从日本开始的，日本和德国的医疗电子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质在那个年代首屈一指。

1998年，远光瑞康的前身——湖北瑞康商贸公司成立，主要是代理日本电位治疗仪产品。许多有健康需求的人通过体验，感受到了电位治疗仪的效果，希望也能够拥有一台，但是在24年前，日本生产的电位治疗仪动辄上万元的价格令消费者难以承受，这让我十分难过。如何打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如何让国人都能用上买得起的医疗器械，这是摆在我眼前的巨大难题，也是我心头久久难以抹去的忧愁。

在我看来，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人们对健康的追求是一样的，也是平等的，不能因价格而把他们区别开来。我的“倔劲”由此爆发——我不甘做代理！我要研发生产中国人自己的电位治疗仪，做百姓买得起的电位治疗仪。

“雄心壮志”口头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且做成功，还得有真正的实力，真正有这份天赋，有这份创造力和行动力。2001年，我依托武汉的高校科研资源果断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研发队伍，正式立项研发电位治疗仪。由于是国内第一家民营研发，所有可参考的资料都来自于国外，往往需要一边翻译一边研究，这使得研发工作难上加难。

从研发到面市，历时整整两年。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长达两年的投入意味着亏损。为什么放着好好的赚钱买卖不做，而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做一件前途未卜的事？两位股东因无法理解而坚决撤资，



董林艺与工程师在车间

研发生产之路雪上加霜。

2003年，中国第一台国产电位治疗仪终于试制成功。经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梨园附属医院几个月的临床实验，由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审专家对产品标准和临床进行严格审核后，远光瑞康电位治疗仪顺利上市。与进口的产品相比，性能指标一样价格便宜了60%左右，加上过硬的品质，不错的功效，迅速打开了市场，赢得了消费者们的广泛赞誉，以及行业认可，远光瑞康电位治疗仪当年就获得了“中国消费者首选放心亚健康产品”的殊荣，远光瑞康科技有限公司也因此能在造福社会的同时，迎来了一次蓬勃发展的机会。

老吾老及人之老

作为国内电位治疗仪领域第一家“吃螃蟹”的企业，远光瑞康虽然成功研发出自己的电位治疗仪，但如何才能将这些质优价廉的产品卖出去，并使之惠及广大消费者呢？在大健康意识非常缺乏的当时，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系统工程。

我经过慎重思考，将远光瑞康的产品定位聚焦于家庭市场。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

个成员健康状况出了问题，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幸福感也会大打折扣，医疗资源也有限。如果能够将健康养生和一般性保健、治疗在家里解决，能够大幅度降低就医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在家里治疗慢性病和健康管理也比到医院愉悦得多。

怎么让消费者相信产品的功效呢？我决定不走寻常路，开启免费体验的先河。我将远光瑞康的体验馆开到各大社区，主动邀请消费者上门免费体验。这一招，果然见效——开始人员稀稀拉拉的体验馆，很快人满为患，排队等候。消费者在亲身体验到远光瑞康电位治疗仪的效果后，不但主动购买，而且口口相传。

2008年6月，我在第八届华人华侨创业洽谈会上，与美国发明人克里斯先生结缘，并与他达成合作协议，委托我的公司为他代工生产健康检测评估修复系统的健康管理设备。

2010年10月，远光瑞康受邀参加在迪拜举办的国际医疗保健器械展览会。展会上，远光瑞康展示了自己最先进、最科技的产品——“电位治疗仪”，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同行的好评，系列医疗健康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2014年7月，《电位治疗设备》行业标准预审会在国家天津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举行，多名业内资深专家及杰出电位治疗设备生产企业的工程师受邀参与讨论，远光瑞康技术部工程师向大会提交了6项电位治疗设备标准修改意见。

2014年10月我们与美国合资的企业爱托优健康管理公司获得政府核准成立。2018年依托美国股东的核心技术，进行产业升级，打造

了“数字化健康管理”云平台，结合首倡技术“6S健康管理方法”输出“睡眠管理项目”，在全国招募合伙人共建“健康管理中心”。以“上医治未病”的理念，为民众提供“睡眠、血糖、血压、情绪、免疫力、消化”等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

2015年8月，远光瑞康推出新产品——脉搏血氧连续监测仪。该产品通过监测记录人体血氧饱和度和脉率，进而对呼吸暂停综合征进行初筛，同时也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致病原因进行筛查，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和对症治疗，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的健康管理。

经过多年的努力及沉淀，如今，远光瑞康科技公司以成为一家研发、生产家庭健康理疗、健康管理、医疗器械等设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医疗设备有：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高电位治疗仪”，国产替代日本进口，主治失眠；二类医疗器械“脉搏血氧连续监测仪”，获得中央财政养老产品的资金支持。家庭健康理疗设备有：“能量养生仪”“场能健康器”“能量光灸仪”“能量睡眠仪”等。美国“健康风险检测评估修复系统”设备中国代工生产。



与美国发明人克里斯先生在长城上的合影

不难发现这么多年我所有的产业布局都围绕着大健康领域，并且最后都聚集在治未病的“数字健康管理”上，很多人不解，公司发展有一定规模后我是具备多元化发展条件的，为什么不呢？这得从我选择大健康行业的初心说起。

1963年9月，我出生在江西九江柴桑区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都是本分朴实的农民。小学为了赚取我的学费，母亲起早贪黑带我到集市上卖鸡蛋，父亲为了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恨不得扎根在田地里。常年累月的繁重农活，父亲背压弯了，母亲有严重失眠和关节痛，都有不少健康隐患。我工作后家里经济出现好转，但父母一系列的疾病都凸现出来，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那时我就立志要帮父母去掉身上的疼痛，老吾老及人之老，我还要把健康带给每一个平凡且努力的家庭。正是这份给父母的爱的初心支撑我熬过了很多晦暗的时光。

福来者福往，爱出者爱返

不论工作多么繁忙，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到全国各地的爱托优健康管理中心去走走瞧瞧。只有倾听来自消费者最真实的声音，才能准确地了解到他们的需求。通过与用户的互动，把我所倡导的新健康、新生活理念传递给大家。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危害我们的疾病也越来越多了。我生产的仪器能带给我们健康，但健康肯定不是简单一台仪器就可以完全解决的，要全面系统来考虑人的健康问题，要从整体上给消费者一个综合健康解决方案，关键要改变生活方式，还要提高民众的健康素养。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战略”，要求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2018年远光瑞康进行产业升级，结合国内外健康管理和慢病管理服务经验，进行数字信息化健康管理服务技术的提升，企业从销售产品到为消费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重点选择了“数字睡眠管理”这个细分品类，以及与睡眠相关慢性疾病的控制和管理服务。

责任与爱总是相生相伴。多年来，我不仅热衷于推广健康新理念，更醉心于公益事业。有些事情，不仅仅是单凭金钱就能抚平的，也许一番温情的话语、一次热情的相助，就能让那些缺少关爱和身处困难的人，感受到生活的希望。

2012年11月15日，我发起成立湖北省慈善总会远光瑞康爱心基金，多年来，持续为扶贫济困、助学、帮助特困家庭、关爱老人贡献自己的力量。2019年荣获湖北省慈善总会颁发的“童享阳光——困境儿童助养计划”项目代言人。

从2013年起，我就坚持在企业、园区、社区推广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节假日带领家人和同事走进社区、企业、学校进行垃圾分类科普宣讲近百场。同时，在万科社区建立了“环保教育站”，每周六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从微不足道的公益小事着手，积少成多，让更多的普通人以集体的力量来实现公益理想，在我看来微公益的关键是启迪作用，把这份爱传递出去，这才关乎公益的本质意义。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春节”计划，处于这场风暴中心的武汉，医疗物资十分紧张。此时人在江西老家的我，心系武汉，立马



武汉市九江商会首任会长董林艺

积极发起“疫情阻击专项募捐”。虽然已经57岁，但我依然不顾家人反对，只身“逆行”。太太因为担心我的身体，虽然恐惧，但依然坚定选择陪着我一起“逆行”，重返武汉对接防疫物资。

我利用这二十多年做医疗器械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通过国内外各个渠道筹集了大批医用防护物资，支援96家新冠定点医院和医疗机构。并在企业内部成立“阻止疫情领导小组”，协助做好群防群控工作部署，全力做好资金募集、物资采购、后勤保障、科学预防宣传等防控工作。

因为抗疫的战斗过程中贡献突出，2020年5月，我很荣幸收到了湖北省慈善总会发来的《感谢信》和颁发“新冠疫情防控慈善行动特别纪念章”，同时陆续收到孝感市、黄冈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同济医院、金银潭医院、中南医院、十堰太和医院等二十多家机构的感谢信，也在2021年1月被湖北省医疗器械协会评为“2020年度抗

击新冠病毒疫情先进单位”。比起获得的荣誉，我更欣慰的是在抗疫过程中，看到武汉这座英雄城市没有被艰难险阻所压垮，大家同心协力、英勇奋斗的身姿，深深铭刻在我的脑中，成了我这一生中最宝贵、最值得骄傲的回忆之一。

2019年3月，几位在汉九江籍企业家找到我，并表达了成立商会的想法。成立商会将架起非公有制经济与政府的桥梁，让在武汉的九江籍企业可以资源共享、抱团发展，更好地建设武汉，也能更好地带动家乡九江发展。这是共话发展、以商惠民的大好事，我立马就应了下来。

“必须把商会搞起来！”说干就干，我立即把商会成立列入重点工作计划，积极调研商会筹备工作，带领商会筹备小组拜访九江市工商联、武汉市工商联，请湖北省社会组织总会会长指导，终于在2019年12月，武汉市九江商会获批成立。筹备组先后组织了19次筹备会议和6次理事预备会议，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把商会的组织架构搭建了起来。

新冠肺炎疫情中，商会会员募集资金，多次采购物资送往九江援鄂医疗队，共募集捐出防护物资价值达660多万元，送达近百家防疫医疗机构。面对会员企业复工复产种种难题，我们积极走访，深入一线了解困难，并动员会员单位内循环，抱团取暖。

在别人看来这些都是付出，是奉献；于我而言是收获，是爱的滋养，让我内心无比富足。正如我从事的健康产业，自我健康的同时也造福了大家。未来我希望将远光瑞康打造成一个集物理治疗、医疗顾问、健康管理服务、养老服务为一体的家庭健康产业帝国，我将为之继续奋斗。

郑凯卿：“文华”走出的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

◇ 付 强

郑凯卿“回”华师

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征集到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郑凯卿的两件珍贵实物档案：一件是他早年读书时使用并陪伴一生的木柜，一件是抗战时期在川东云阳为抗日游击队送药的专用木箱。

1888年3月24日，郑凯卿出生于湖北武昌青山铁铺岭松树湾。1906年，郑凯卿进入文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当校工，在这里与陈独秀结缘。1920年8月，他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张国恩寓所内，加入共产党武汉支部（即武汉共产主义小

组），从一个穷苦孩子成长为早期工人运动领袖。

1966年11月15日，郑凯卿在潜江总口农场他小儿子郑邦才家中离世，享年79岁。从成为党的一分子那天起，他便秉承初心，殚精竭虑，心中装满了事业和穷苦的阶级兄弟，为战友出生入死。

捐赠两件文物的郑凯卿后人介绍，木柜、木箱都是郑凯卿本人亲自动手做的，印证了郑凯卿的墓碑碑文中对他的介绍“……他知医道，懂烹饪，也会泥塑、篾、藤、木工，常以此作掩护为革命工作。”这两件文物，是郑凯卿传奇经历的见证，也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史上的红色印记。

与此同时，档案馆收到郑凯卿女儿郑季霞撰写的《我的父亲郑凯卿》（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认为，《我的父亲郑凯卿》一书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郑凯卿的革命英雄形象，对郑凯卿的革命经历的集中展示，体现出共产党人炽热的家国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感知、认识、理解党的初心，对于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有着重要意义。

在“文华”接受革命真理

1906年，郑凯卿进入文华大学当校工，为食堂挑水、做厨师，后来身兼童子军劳作课技师，深受师生喜爱。他在文华大学受到新思想的启蒙，积极参加文华国文教师刘静庵创立的“日知会”，在“日知会”图书报刊阅览室与董必武相识，后与董必武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1911年，武昌起义期间，郑凯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协助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为革命军筹集数万石大米，为首义成功做出了贡献。

1920年2月4日至7日，陈独秀受文华大学邀请参加学生毕业典礼并作报告，这一期间由郑凯卿负责照料他的起居生活。1920年2月5日下午，文华大学公书林礼堂，陈独秀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郑凯卿挤在学生中间听讲座。陈独秀的演讲深入浅出，郑凯卿听入了神，“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黑暗之中出现一条光芒万丈的大道，让我们看到了希望。”30多年后，郑凯卿这样向女儿形容当时听演讲的感受。



郑凯卿

讲座后，郑凯卿找到陈独秀，把感受告诉了他。陈独秀握住郑凯卿的手说：“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你。”接下来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交谈。陈独秀有意为建党培养后备党员，尤其是像郑凯卿这样的工人，向他介绍了《新青年》《湘江评论》杂志，以及天津的“觉悟社”，从而影响了郑凯卿。在陈独秀的引导下，郑凯卿组织文华大学学生，对武昌纺织局、纺纱局、麻布局、铜币局、银币局的工人情况进行了调查，成文《武昌五局工人状况》，以文华大学生的名义刊发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号。

光荣入党投身劳工运动

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郑凯卿参加了成立会议，会议决定他负责劳工工作。1921年，郑凯卿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开始在武汉地区组织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维护工人的合法权利。他以文华大学校工的身份，帮助多家工厂的工人组建工会，并召集武汉人

力车工人参加夜校学习。同时，他积极到平民夜校上课，自编简单课本，宣讲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与工人分享学习心得。

1921年，郑凯卿与施洋、林育南等人召集武汉人力车工人代表，筹划反对人力车老板加租的行动计划，他提出并主导成立了人力车夫工会，维护工人权利。施洋被聘请为劳工律师和顾问，起草了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抗议车行老板的加租行为。1921年12月7日，在郑凯卿的带领下，汉口租界6000多名人力车夫举行了罢工游行，唤醒了武汉人力车夫等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的革命意识。最终，经过工人代表与汉口商会的谈判，车行停止了增加租金，赔偿了罢工期间的损失。

罢工行动成功后，武汉地区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分别于1922年1月和2月成立了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武汉第一个工会组织——汉口租界人



郑凯卿亲手制作的储物柜

力车工会。1922年7月，中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也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地方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郑凯卿担任联合会组织部秘书，与联合会其他同仁一起团结地方工人开展维权运动。

1923年，军阀吴佩孚反对京汉铁路工人成立总工会，陈潭秋、郑凯卿、林育南、施洋等共同起草《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言》，并组织京汉铁路全线铁路工人和武汉各工团、各界群众罢工，形成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京汉铁路总工会。此次示威游行后，军阀对武汉三镇的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二七惨案”的发生让工人阶级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共党员、工人运动领袖施洋律师遭到北洋军政府逮捕。郑凯卿和林育南、陈潭秋等人筹划营救施洋，但未能成功。施洋遇害后，湖北军阀萧耀南一度下令不准收尸。郑凯卿组织人力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施洋遗体悄悄收殮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武汉党小组随后暂时疏散，郑凯卿离开武汉前，对妻子最后的叮嘱是：要多去看望和照顾施洋的遗孀。后来，湖北督军贴出悬赏告示，15000元现洋悬赏董必武人头。郑凯卿化装成人力车夫，安全护送董必武登船离开武汉。1927年大革命失败，周恩来从上海赶到武汉，郑凯卿克服重重困难接应周恩来从汉口过江到武昌与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进行历史会晤，不久，周恩来、贺龙等在江西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1931年初，为恢复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武汉党组织，郑凯卿肩负重要使命回到文华大学，在文华大学附中任工艺教员。当他看到人力车工人在冷风刺骨的冬天无处藏身御寒，郑凯卿发挥其精湛的木工技艺，

和文华中学的学生一起，在武昌汉阳门轮渡码头旁搭建了一间纯木结构的活动板房，挂上“工人烤火处”的牌子。冬天武汉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取暖、烤火，到了夏天，则将木房四周的木板拆下，这间小木屋又成了工人人们的饮茶的庇护所。原文华大学学生孟寿彭、宋百廉、杨庆生等同学都曾和郑凯卿去汉阳门“工人烤火处”，为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服务，他们一直不知道郑凯卿的真实身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郑凯卿是中共党员。“烤火处”不仅温暖了工人的身体，也温暖了工人的心。郑凯卿在武汉工人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和这个“烤火处”的设立、郑凯卿对工人的知冷知热是密不可分的。

从保护难童到迎接解放

1938年3月10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以收留1.6万名来自战区失去父母、流离失所的难童。武汉沦陷前，董必武指示郑凯卿和保育会救援人员一起，将难童分批护送到宜昌，再换小船入川，分别安置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他一家前后辗转四川、宜昌等地，因时间紧迫，郑凯卿夫妇没有等到自己的两个孩子邦文、邦达回家，就忍痛踏上西迁的征程，从此和两个孩子失去联系近10年。在各方努力下，郑凯卿和保育人员历经千难万险，将“儿童保育会”的儿童安全送至奉节、云阳、万县、重庆等地，圆满地完成了救援转移难童的任务。后以四川云阳县大华炼油厂事务员、云阳慈善堂孤儿院、云阳县中心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为游击队送药送粮。



郑凯卿为游击队送药的专用药箱

1946年秋，郑凯卿从四川回到武汉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总务处工作。为了反抗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里面安插的密探，他号召学生建立了“新教协”“新青社”等组织，在学生社团和学生活动的掩护下，组织学习党的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以抵抗国民党的监视以及对进步学生的毒害。

在“六·二”反内战总罢课大游行过程中，郑凯卿积极保护参与游行的童子军师范学校的学生，并在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后，帮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进步学生的暴行。1948年春到1949年初，革命即将胜利时期，郑凯卿等地下党员按照“平行作战、单线联系”的原则，把进步师生组织起来，投入“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保卫武汉、迎接解放”的斗争，郑凯卿劝说童子军师范学校校长孟寿彭开展护校运动，组织同学们保护学校设施和粮食，使学校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保存完好，保证了军管会文教部顺利接管。

尘封功名不要组织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邀请郑凯卿前往北京工作，郑凯卿婉言谢绝了。郑凯卿的战友、武汉市首任市长吴德峰安排郑凯卿出

来工作，郑凯卿明确表示，革命成功了，他的最大心愿就实现了。由于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和条件，致使他晚年身体不好，经常咳血，国家的建设和管理应该交给更年轻、更有能力的人去做。他此后就一直拿着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和退休工资。

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家里的日常开支就显得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但郑凯卿从来没有向组织开口提过一次要求。为了改善生活，他的妻子李雅卿约上邻居黄婆婆，把自己编织的生活用品送到武昌火车站等处售卖。从家里到武昌火车站有一条小路稍微近一些，可以节省一些体力。但这条路崎岖不平，与一条铁路交叉，且要经过一段上坡，非常危险。为了生计，两人不得不每天起早贪黑在这条路上奔波。

1959年12月2日，李雅卿与黄婆婆照例去售卖生活小用品，在上坡与铁路交叉的地方，黄婆婆的手推车被卡在了石头缝里。一辆火车开过来，李雅卿为救黄婆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对数十年与妻子相濡以沫的郑凯卿的打击是巨大的，但郑凯卿把这份痛苦埋在心里，依然没有给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第一位工人党员”的由来

对于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工人党员，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主要争论集中在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郑凯卿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中到底谁的入党时间更早。

认为李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的，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198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罗绍志《我党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2017年第17卷第5期《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曾长秋《李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

认为郑凯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的文章有：1990年第3期《理论学刊》孙向忠《究竟谁是我党的第一个工人党员》，1996年第1期《武汉党史》李婉霞《第一个中共工人党员确系郑凯卿》。

要确定谁是我党的第一个工人党员，就是要在确定具备工人身份的前提下，看谁的入党时间更早。曾长秋一文尾注中认为，郑凯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这种判断失之偏颇。郑凯卿自幼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8岁就扛着扁担带着绳子，跟随父亲到车站、码头当挑夫。他10岁和11岁时父母相继病逝，哑巴妹妹送给黄姓人家做童养媳，他只身一人在沙湖一带流浪，被好心的人力车工人陈万年、唐秀芝夫妇收留，生活得以安定下来。

为了给陈万年家减轻一些经济负担，郑凯卿到其所在的人力车行当了几年小工，18岁时进入文华大学做校工，先后司职送水、厨师和“童子军”技师，教学生做铁工、木工和园艺栽培，被师生称为文华大学的“万能师傅”。“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郑凯卿“他每天工作很忙，但工资很少，对工人的苦难体会很深。”后来，陈独秀委托刘伯垂发展郑凯卿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负责劳工工作，与郑凯卿的工人身份有直接关系。

李中，原名李声懈，湖南湘乡人。1918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应是一名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毕业不久，他来到上海，在一家古董玩具店帮工。1920年春，他结识了陈独秀。在陈的鼓励下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到江南造船厂当了一名钳工，有了工人身份。

这样看，郑凯卿、李中两人的工人身份应没什么区别。

再看两人入党的时间。

李中是先入团后入党的。李中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且是15名成员中唯一的一名工人党员，但他并不是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加入的，而是在1921年“五一”劳动节后至“一大”召开之前加入的，依据是：李中是先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0年8月22日，建团时的8人中没有李中，李中是建团后发展的首批团员之一。由于当时的党团关系十分密切，李中受指派帮助陈独秀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但他此时的身份仍然是团员。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李达回忆：“……于是，党就将各地来沪的青年挑选了二十来人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派党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主持。意思是准备从中挑选预备党员。罗觉（亦农）、任弼时、李中、李启汉等都是这批参加的，后来他们都入了党……当时派李中在杨树浦进行组织机器工会，李启汉在小沙渡进行组织纺织工会。”（《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说明李中不是入团后马上入党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才入党。

其一，李中入党时间应与其湖南同乡李启汉相同或稍晚。李启汉也是从湖南到上海的进步青年，与李中等人同时入团，同样受党组织的指派从事工人运动。包惠僧回忆，1921年初，他从武汉来到上海，“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只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不久到日本去了）、沈玄庐（他来来去去，不常在上海）、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似还是1921年春天才加入），沈泽

民是初夏才加入，李启汉是同年‘五一’劳动节后加入”（《包惠僧回忆录》第4页），这里没有提到李中，不过因为他的情况与李启汉类似，同时入党或稍后一点的可能性较大，时间应该在1921年“五一”劳动节后至“一大”召开之前。

其二，李中墓碑的碑文中标注其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1951年7月9日，李中病逝，灵柩由家人送回故乡湖南省双峰县石牛乡采桑村三龟塘安葬。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前夕，当地政府对墓葬重新修葺，“墓志铭”上写着：李中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郑凯卿的入党时间则非常清楚：1920年8月。1920年春夏之交，受陈独秀的委托，刘伯垂回到武汉发展党组织，陈独秀还特意介绍包惠僧和郑凯卿做其助手，1920年8月，由刘伯垂主持，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张国恩寓所内，共产党武汉支部（即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刘伯垂、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7人，只有郑凯卿是工人。

由此可见，郑凯卿的入党时间比李中早了9个多月，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确定无疑。

付强，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馆长、校史研究中心主任

古德寺腾退记

◇ 麻杰

古德寺，坐落于汉口黄浦大街旁，始建于1877年，至1930年代初主要建筑大体完成，与归元寺、宝通寺、莲溪寺并称为武汉地区四大佛教丛林。2013年，古德寺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德寺建筑风格独特，主要表现在：它以中国汉语系佛教建筑文化特点为主，兼揽汉语系、巴利语系等佛教流派的建筑文化特点；它以中国佛教建筑文化特色为主，兼容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及道教的建筑文化特色；它以中华建筑文化为主，兼收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

欧陆、东南亚等地区的优秀建筑文化。由此，它成为世界唯一具备如此风格的建筑，具有



古德寺雄伟巍峨风格独特

很高的建筑艺术、文化交流及近现代史迹方面的研究价值。

“文革”期间古德寺暂停宗教活动，1974年武汉照相机厂入驻使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我有幸参与了古德寺的腾退工作。

陈华芳副市长主持协调

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谈何容易，当年百废待兴，宗教尤难。

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为什么要去恢复有神论的宗教呢？1982年3月，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我们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员，正是通过认真学习这个文件，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宗教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政治上团结一致、信仰上相互尊重，把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

其次是利益问题。落实宗教政策既要尊重历史，又要考虑现实。占用宗教场所的单位在思想上通了以后，都面临很现实的问题，即往哪里搬？有多少搬迁补偿？人员怎么安排？还有衍生的其他许多问题。1986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成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重点工作之一都是致力于解决这方面的难点问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当年，市政府下发武政办（1986）131号文件，对武汉照相机厂提出从古德寺腾退的意见，但终因难度太大而搁置。

我于1994年任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宗教



维修大雄宝殿

工作处处长，此前我的前任为恢复古德寺做了大量工作。1994年5月27日，在市人大、政协呼吁下，在我局积极反映和建议下，陈华芳副市长主持召开古德寺腾退协调会议。我局陈昌靖、熊继汉副局长和我参加，厂长动集团夏梅生副总经理（武汉照相机厂1987年10月由长动集团兼并）、武汉照相机厂熊德忠经理参加。

会上，熊德忠介绍了照相机厂1974年成立以来的发展情况，其鼎盛时期有车间八个、职工千人，近年由于各种原因而亏损严重，不久前被江岸区法院查封了账号，腾退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夏梅生表示，长动集团兼并照相机厂后，已投入2000多万，其中1000多万还了债务。如腾退，上千名员工、大量的机器以及厂房都要安排，希望市政府在土地、资金等方面给予补偿。

在听取各方人员的意见以后，陈华芳副市长最后确定：第一，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古德寺必须腾退，何况其大雄宝殿还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第二，为了照顾企业方面的困难，可以分期腾退，第一期只腾退大雄宝殿等4800平方米，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做好宗教界的工作；第三，给企业

的土地、资金补偿要测算和研究，但口子不能开得太大。

会后，市政府李子诚副秘书长又多次召集相关单位分工协调，确定：市规划局研究古德寺周边房地产开发的可能性及周边土地补偿的可能性；我局负责做宗教界的工作并争取长动集团的基本认同，同时和机械局一起测算照相机厂搬迁的土地、房屋、车间、机器等相关费用。

为了推进古德寺腾退，我局成立专门工作小组，由熊继汉副局长牵头，成员有刘进英副局长、我及宗教工作处同事陈家良，还有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林炎山。

实地考察大雄宝殿和天王殿

1994年8月5日，我和林炎山会同市机械局熊绍基工程师到古德寺，实地考察大雄宝殿、天王殿及周边土地的情况。站在山门前，我感慨万千，寺内高大的古树依旧郁郁葱葱，但山门不是记忆中的模样。1966年前，我曾多次来此游玩，人非昨日之少年，



维修大雄宝殿尖塔

物亦非昨日之景象，老山门已拆除改建方便汽车进出，门柱上挂着“武汉市照相机厂”牌子。

进门后一条较宽的水泥干道，左边一栋后建的三层办公楼，右边便是原来的天王殿。还未走到天王殿门口，一股呛人的油漆味扑鼻而来，原来它已改建成了油漆车间，摆满各种加工部件。

随后，我们向大雄宝殿走去，我记忆中的花园、廊道、僧舍已荡然无存。隔着一条车道，左侧修了一栋三层楼房据称是总装车间，右侧是六层楼的光学车间。大雄宝殿依然显得那么巍峨，但岁月也在它身上留下了沧桑印记，有的浮雕脱落，墙壁出现些许裂痕，屋顶沟槽倔强生长的小树野草在风中摇曳。

从大雄宝殿传来“啾啾”巨响，每一声都引得脚下震动一下，厂方人员告诉我们它是冲压车间。走进大雄宝殿一看，我惊呆了，不仅满满排列着各种机器，中央还挖了一条长长的深沟。为了120照相机外壳成型，殿内安放了冲床14台，其中100吨的两台、63吨的一台，其余的也达16吨。此外，还有剪床一台、双挂可倾压力机6台。那一刻，机器的轰鸣声已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震耳欲聋的是那几十吨、上百吨冲床的冲压声，仿佛大殿都跟着颤抖，但居然没把大殿震垮。我不由向周围的人员感叹：“真是扎实啊！看来这个建筑当初修的确实是非常坚固。”同时，我也更增强了把大雄宝殿收回来的强烈责任感。

我们将勘察得来的情况，与专家一起分析研究，测算得出需要的大概资金。市政府办公厅也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分析研究土地、房屋和机器拆迁安装的费用。我们与长动集团夏梅生、照相机厂熊德忠多

次协商，但由于企业的要求太高，迟迟不能够达成协议。

赵宝江市长现场办公

1995年2月，市人大再次提出议案，要求腾退古德寺。我们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取得一定进展。与此同时，积极做好宗教界人士的工作。1995年4月28日，我随市委统战部胡照洲部长、熊继汉副局长到归元寺，向担任省、市佛教协会会长归元寺昌明方丈，通报古德寺腾退工作的进展情况。昌明方丈同意分两步走，先把大雄宝殿、天王殿退出来，由市佛教协会出钱维修，以后时机成熟再腾退其他部分。

在这次交谈中，昌明方丈首次提到了原佛教清济寺尼众的去向问题。清济寺所在的袁家墩社区因旧城改造整体拆除，在新建楼房中安排两层还给清济寺，并按佛教寺庙的式样装修，但尼众不愿上楼。因此，昌明方丈提出是否可以让这些尼众住到古德寺，胡照洲部长表示尊重市佛教协会的意见。

1995年5月3日，我随胡照洲、熊继汉到长动集团与董事长于志安交换意见。于志安表示同意分期腾退古德寺，同时将古德寺的门开在西边，与照相机厂大门分开。另外，于志安也特别希望政府能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及上千职工的困难，在附近划一块地给照相机厂，拨款800万新建车间，建成后腾退古德寺全部。

1995年5月10日，赵宝江市长一行到照相机厂召开现场办公会。参加现场会的有陈华芳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胡照洲和副部长周启新（兼任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市土地规划局局长睦录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熊继汉、刘进英，江岸区副区长唐



古德寺雕塑精美别具神韵

昌海。长动集团董事长于志安、副总经理夏梅生和照相机厂经理熊德忠等参加。

会议议定：第一，从长远看，照相机厂必须整体搬迁，但目前作为权益之计，先腾退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一部分；第二，将大雄宝殿、天王殿及其西侧的土地都腾退给古德寺，厂门和寺门分开，将上滑坡路的门及道路都划给古德寺；第三，将照相机厂靠工农兵路一侧的13000平方米土地，交由长动集团进行商业开发，拆迁还建中政府给予各项减免税费优惠政策；第四，政府拨300万帮助建车间2100平方米。

于志安半开玩笑地问赵宝江市长：“你这么大的一个武汉市市长，掌握着那么多钱，就不能多给我们200万？”赵宝江正色回答：“再多的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当市长的也不能随便乱用。”会后出来一起走向停车场时，我注意到一个插曲：与赵宝江交谈的于志安不小心被一个石头绊了一个趔趄。世事难料，1995年6月，于志安

出逃菲律宾，原本顺利的腾退工作又被意外事件突然打断。

与长动集团新班子再度协商

1995年11月14日，在听闻长动集团组建新班子以后，受陈华芳副市长和市政协胡照洲副主席的委托，周启新局长，熊继汉、刘进英副局长及我，到长动集团与新上任的夏士杰总经理、赵国忠书记商谈腾退问题。议定如下事宜：

第一，不论谁当长动集团的领导，都要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按照赵宝江市长上次现场办公会定的原则，完成古德寺腾退工作；第二，工厂应立即做好政府所划地块的商业开发建设方案，直接上报市政府审批；第三，腾退工作要抓紧，最好在明年上半年完成；第四，为了保证腾退的顺利进行，请长动集团做好工厂领导和职工的思想工作，必要时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也可出面；第五，可以分步实施，先腾退天王殿让清济寺尼众入住，然后腾退大雄宝殿，在厂内空地搭建棚子暂时安装机器。夏士杰总经理表示会立

即督促厂里启动相关工作。

1995年12月27日，市人大副主任夏菊花率市人大民宗侨外委员会李开江主任，周斌盛、刘善感副主任等检查我市民族宗教工作，特别提出古德寺的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要求1996年必须迈出第一步。

1996年元月11日，我与陈家良约见照相机厂熊德忠经理，商讨具体实施方案。熊德忠介绍了照相机厂的现状：在职职工近800人，退休职工300人；厂里已欠外债400万，长动集团已投入4000多万并表示不再投入。因此，希望政府能安排总体搬迁或出资2000万将职工整体买断，若分期腾退能否再加些钱。

我当时明确答复：将来照相机厂肯定会整体搬迁，但短期内不可能，还是按照赵宝江市长现场会定的原则分步实施，这点已与长动集团领导达成了共识。另外，市政府最多拿300万元，不可能再增加。厂里的生产上去应向内使劲，同时要注重开发政府划给的地块，政府给的开发政策已经非常非常优惠了，请你们抓住时机。厂里的职工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我们愿意在职工代表大会或是中层干部会上协助你们做好工作。

最后商定：第一，厂领导班子立即敲定工农兵路一侧地块的开发方案，由我联系市政府帮助协调落实各项政策；第二，同意在上述基础上，由市佛教协会出钱派人维修古德寺残留的觉幻室和方丈室，以便清济寺尼众入住。

终于举行腾退交接仪式

1996年1月26日，我带熊德忠经理等厂方人员到市政府相关处室，



作者（右二）与有关人员现场研究维修方案



作者（左一）与有关人员现场指导维修施工

协调开发中的一些实际问题。1996年3月15日，我随熊继汉副局长到市人大汇报进展情况，说明古德寺腾退遇到的困难。李开江主任表示将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敦促市政府重点协调解决。

在市人大的敦促下，1996年3月22日，市政府召开协调会议确定了腾退的具体操作步骤：第一，以照相机厂为主抽调3至5人成立专班，由主要领导一人专门负责，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助；第二，由市规划局拿出细化方案，核定面积、方位及涉及的单位；第三，方案出来后，照相机厂与市佛教协会履行认可手续，于月底前完成；第四，尽快落实资金，与有关部门协调到位；第五，尽快将大雄宝殿、天王殿中的机器搬迁。另将西侧75号的住户搬迁，打通作为古德寺临时进出通道，争取市佛教协会尽早进场维修。

此后，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先后三次召开协调会议，逐项推进落实相关问题，确定：第一，立即拨100万给照相机厂，其余200万按进度准时拨付；第二，6月上旬请照相机厂、市佛教协会和市规划局共同做

好厂、寺划分图，并按新的范围办理有关证件；第三，照相机厂办理新建厂房的规划手续并启动建设，7月下旬腾退完毕，8月上旬办理移交手续，市佛教协会即可开始修建围墙；第四，武汉照相机厂立即与规划局办理工农兵路侧征地手续。

此次会议以后，我又数次带领市佛教协会人员到现场督促，并实地勘测方位、打围墙，筹建尼众住房。同时敦促相关人员于1996年8月15日办理了由市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古德寺国有土地使用证。此次腾退土地面积为5122.03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2002.26平方米。让人欣喜的是，在腾退的范围内，不仅有重要历史文物大雄宝殿、天王殿，还有西院的参天古树。

1996年9月3日下午，举行简朴的古德寺部分腾退交接仪式。陈华芳副市长出席，她表示：“从1986年到1996年整整十年，各方面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腾退古德寺的工作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市人大、政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要求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指导市佛教协会，加强对古德寺的管理，尽快恢复古德寺的原貌，并与江岸区政府共同商量外部环境的改造，把古德寺真正建成佛教信众的向往地、优秀历史文物的展示地和市民群众旅游的目的地。

不久，原佛教清济寺的48名尼众在演顺法师的带领下顺利入住古德寺。此后，古德寺逐步腾退并维修，党的宗教政策得到完全落实。

麻杰，原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探寻蛇山上的古刹道仙（下）

◇ 董玉梅

道教宗师吕仙

蛇山上关于吕仙的传说很多，涉及他的建筑有吕仙亭、仙枣亭、纯阳楼和吕祖阁；吕祖阁内供奉着吕仙的卧像。晚清民国年间，不少香客专门来蛇山矶头朝圣，使吕祖阁香火很旺。1956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吕祖阁拆除。吕仙卧像迁入长春观，长春观遂将大士阁改称吕祖殿。“文革”期间卧像损毁。今天殿内的立、坐、卧三尊神像，都是1980年代后重塑的。

吕仙是仙，也是一个真正的人。《黄鹄山志》中记有吕仙的传说故事：吕仙名叫吕岩，字洞宾，自称为回岩客，也称为回道人，是河中府永乐镇（今山西永济县）人。唐武宗会昌年间，两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



明代曾鲸绘制的吕仙像

乃抛弃仕途，游山玩水于庐山。在庐山遇见一“异人”，异人传授给他剑术和长生不死之秘诀，于是成仙。活动地域多在“湘潭鄂岳”之间。

《黄鹄山志》的记载确实很对，我在岳阳听过有关吕仙的传说，也在洞庭湖君山

上的朗吟亭见过吕仙的塑像，塑像面容凶狠，与想象中的玉树临风相距甚远，令我颇为诧异。君山也有吕仙与蛇山相关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杜然康的人，十分好仙。听说吕仙常在岳阳楼喝酒，便不辞辛劳，天天在岳阳楼等待吕仙的出现。岳阳楼下有一个穷叫化子，天天在檐下喝酒，喝得醉醺醺时就来戏弄杜然康。杜然康只好离开岳阳，前往黄鹤楼游玩。不料在黄鹤楼又遇见这个叫花子，叫花子在地上写字，许多人围着看。杜然康也挤进去，看到叫化子写的是：

几日未见杜然康，今日相逢在武昌；
曾记岳阳楼上会，与君随手画沧浪。

杜然康一下惊呆了，原来叫化子就是吕仙啊。可是，吕仙已经飘走了，杜然康悔恨自己肉眼凡胎，只好望着天空默祷，祈求吕仙再显神灵。果然，天空中飘来一朵彩云，云中飘下一片黄绢，落在他面前，他拾起一看，上有吕仙的《绝句》诗：

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杜然康读罢，又抬头相望，看见吕仙手持拂尘，身佩宝剑，往洞庭湖方向飘去。

这个传说故事，印证的就是吕仙的活动地域多在“湘潭鄂岳”之间，关于他成仙后的传说与两地密切相关，如在岳州弄鹤、在客店醉酒、在黄鹤楼飞升。因蛇山头是吕仙活动的重要地点，在南宋时期就有吕仙的传说存在。传其在蛇山留有诗作《题黄鹤楼石照》：

黄鹤楼前吹笛时，白蘋红蓼满江湄。
衷情欲诉谁人会，唯有清风明月知。

吕仙诗中的石照，据说在黄鹤楼西侧的临崖处，是一块光洁如镜的巨石，逢夕阳照射则炯然发光，曾为武昌十景之一。宋时，专门为此石建有石照亭，或称石镜亭。吕仙

游石照，写此诗，感叹在人间没有知己。陆游来到武昌，站在石照前，颇为遗憾，因为他看到的石照，只是“粗顽石也，色黄赤皴驳，了不能鉴物，可谓浪得名者”。看来，吕仙的感叹很有道理，知己难寻。即便是陆游，也不是吕仙的知己。同观石照，何以吕仙见为石照，陆游见为顽石呢？

宋代，有关吕仙的传说特别盛行。蛇山上与吕仙无关的故事也附会在了吕仙身上，这就是吕仙洞。

陆游在蛇山，曾出汉阳门，游仙洞。当今一些有关的书籍，就此认定陆游进的仙洞就是吕仙洞。其实非也，这个仙洞，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已经进去了，不仅进去了，还在诗作《望黄鹤楼》中点出了仙人学飞术的故事：

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
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

但这些学飞术的仙人是谁，李白没有说。至北宋，苏东坡也写了一个与此仙洞有关的故事，说有仙人隐居洞中，并且常常出洞游玩。有一次被一个老兵遇见了，仙人给了老兵几块黄金饼，但后来黄金饼化成了石块。

继苏东坡之后，陆游站在了仙洞前。陆游眼中的仙洞，“止是石壁数尺，皆直裂无洞穴之状”。陆游在武昌，真是有太多失望了，他对这个石壁下了结论：“今鄂人谓之吕公洞，盖流俗附会也。有道人，澶州人，结庐洞侧，设吕公像其中。”陆游写的很清楚，说吕公洞的存在是“流俗附会”，但后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忽略前句，只重“结庐洞侧，设吕公像其中”，并言之凿凿的肯定宋代就有了吕公洞。看来，“流俗”的力量非常人所能抵挡，陆游的质疑并未起任何作用。至《明一统志》便把附会变成了结论，

明确记载，黄鹤矶上有吕公洞，因吕仙曾题诗在矶上。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你按自己的意愿来打扮。

吕仙传说的盛行，与宋代皇室对道教的推崇紧密相关。据说，宋真宗在镇压益州民众叛乱时，吕仙曾显化相助，之后被宋真宗加封为“英显武烈王”。宋徽宗崇信道教，宣和元年（1119年）诏封吕仙为“妙通真人”。就是严肃的《宋史》，也在《陈抟传》中记述“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元朝初立，需要笼络汉族人心。元世祖在至元六年（1269年），又封吕仙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再加封吕仙为“纯阳演化孚佑帝君”。至明代，皇室、正史和民间传说共同用力，最终让吕仙成为与观世音、关公齐名的民间神仙。

宋代之后，很多文人写下与吕仙相关的诗作。这些诗作多与吹笛有关。在黄鹤楼的传说中，涉及吹笛的也多与吕仙有关，除了他的《题黄鹤楼石照》写了“黄鹤楼前吹笛时”之外，辛氏酒店与仙枣树的传说中，也都有吕仙吹笛。想想吧，“唐时进士，今时神仙，足蹶紫雾，却归洞天”的吕仙（注：吕洞宾并未中过进士，此处当为溢美之词），再手拿一根横笛，可不就是玉树临风的万人迷吗？所以，明人杨基在洪武四年（1371年）写有《黄鹤楼看雪》，留下了“卧听吕岩吹铁笛”之句；明人沈钟在《复修黄鹤楼记》中说：吕仙多次到黄鹤楼，在月夜里吹铁笛，笛声与天籁之音相交响，时人在楼旁建亭。众多文人墨客的诗赋渲染，让吕仙与蛇山的传说更加风靡，在蛇山半山建起了吕祖阁，其像“角巾卉服、横笛，制甚古”，崇奉吕仙之风趋于极盛。



山西芮城永乐宫混元殿《武昌货墨》

山西芮城永乐宫混元殿，有一幅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的壁画《武昌货墨》，讲的就是吕仙在武昌游仙显化的传说。这幅壁画虽属“界面”，但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建筑是很宝贵的资料，壁画强调外轮廓线，楼阁结构交代明确，斗拱细部清晰，据说修复黄鹤楼时曾以此作为参考。但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黄鹤楼下的吕仙，手执拂尘正在向一位买者兜售纸墨。宋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谈及吕仙“多游湘潭鄂岳间，或卖纸墨于市以混俗，世人莫识之也。”原来吕仙终究离不开尘世生活，总是以做买卖的方式混迹人间。黄鹤楼下有多少人买过吕仙的纸墨呢？

围绕蛇山形成的吕仙传说，确实有做小买卖的。但不卖纸墨，卖桃卖枣，且都很失败。先说吕仙卖桃，其本意是想“度人向善”，让武昌一带的人们敬重孝顺老人。桃从哪里来？是他把拂尘插入石头缝中，拂尘落地生根，长成桃树，结出仙桃。然后，吕仙用老人吃了仙桃可延年益寿来吸引买家。不料，买桃者纷纷把仙桃塞进自己嘴里，无一例外地抛家弃子于不顾，让自己成仙成道。事与愿违，吕仙的良善本意没有改变世俗的贪婪！愤怒之下，吕仙掷桃离去，因用



在蛇山“凭栏而望，万瓦皆伏”

仙枣亭仅百余步的黄鹤楼，其名称就来源于黄鹤矶。“鹤”与“鹄”本为一类，“黄鹤黄鹄讹也”。既然黄鹤与黄鹄都可以讹误，桃

力过猛，掷在地下的仙桃印在了矶石之上，成为抹不去的痕迹。

蛇山上有仙枣亭，仙枣亭有八楹。站在亭内，观“大江自南来，千里而折，凭栏而望，万瓦皆伏”。仙枣亭四周有多株老枣树，亭前的一株呈“半荣半枯”之态。据说，仙枣亭也与吕仙有关，难道吕仙卖桃失败，又改卖仙枣？其实，仙枣亭最初与吕仙无关。仙枣亭的传说，早在明景泰六年（1455年）出版的《寰宇通志·卷五十》中就有记载：

旧传亭前枣木未曾结实，一岁忽有实如瓜。太守命小吏采进，小吏辄私啖之，遂仙去。……又云太守王伦与卒奕，仙忽至云：“太守奕败”。后果败。仙于郡前吹笛因不见，随笛声至楼上，保唯见石镜题诗，末书吕字而去。故又云“吕仙亭”。国朝景泰四年，布政使马谨重建。改今名。

根据《寰宇通志》的记载，仙枣亭与吕仙的关系，只是一种附会罢了，因而在景泰四年（1453年）改称为吕仙亭。

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江夏人郭正域写有《仙枣亭记》，收录在《黄鹤山志·卷六》中。《仙枣亭记》引用了《寰宇通志》上的故事，明确说明仙枣亭与吕仙没有任何关系。可为什么又与吕仙牵扯上了呢？原因就在于黄鹤矶上有吕仙人卖桃、摔桃的故事。对于桃是何物，枣又是何物，郭正域这样下结论：“岭上之枣即矶前之桃”。为何？距离

与枣为什么就不能讹误呢？

学富五车的郭正域，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有根有据，又如是进行论证：黄鹤的故事，有人说与王子安有关，有人说与费祎有关，但今人（指明代）尽归给吕仙。确实，有明一代，市俗百姓都认定黄鹤与吕仙有关。然郭正域只认费祎，其理由是：黄鹤山下最先有费祎洞，说明费祎最早出现在山中，跨鹤之人不是费祎又是谁呢？

郭正域又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明“讹”误的东西很多，并不只在仙枣和仙桃、黄鹤与黄鹄之间。山下的黄鹤矶，原称吕公矶，禹公矶也是“讹”也。这里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如果黄鹤矶也曾称禹公矶，那么元世祖指的禹公矶到底是武昌的还是汉阳的呢？

涉及黄鹤矶上的仙迹，最著名的就是吕仙人。元代吕仙亭内，立起一块出自“宋名望手”的《吕仙亭记》碑，碑文传播很广。所以，民间自然的就把神枣树归之于吕仙了。

读完《仙枣亭记》，感觉在郭正域眼中，吕仙与蛇山的故事从来就没有正确解读过。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文人熊士鹏在《鹄山小隐文集》中也持和郭正域相同的观点，强调“明景泰四年易仙枣亭曰吕仙亭。诗家遂以黄鹤楼为吕岩仙迹。不知有费文祎矣。”尽管如此，在蛇山历史文化中，吕仙占有相当的比重，仅以“仙枣亭”为名的诗作，《黄鹤山志·艺文》就辑录了9首，作者都是明

清时期的著名文士。所以，蛇山如果没有吕祖阁或纯阳楼，还真的说不过去。

毕竟传说中的吕仙，既在黄鹄矶下题诗，又在黄鹄矶上“度人”。所以，武汉人是应该记住吕仙的。让人稀奇的是，盛夏时节，仙枣亭周围无蚊蚋，民间传说这是吕仙仙尘拂过的结果。可是，这个故事与蛇山上的遗迹对不上，在1883年《武昌省城内外街道图》中，仙枣亭和官胡二公祠相连，而仙桃迹却在和观音阁相连的矶石之上，二者怎么会相隔这么远呢？仙枣亭又重建了吗？据1946年《新武汉指南》记载，仙枣亭仍然是明景泰四年建，“相传吕纯阳曾过此，故名吕仙亭……今檐下，何绍基书‘仙枣亭’三大字，匾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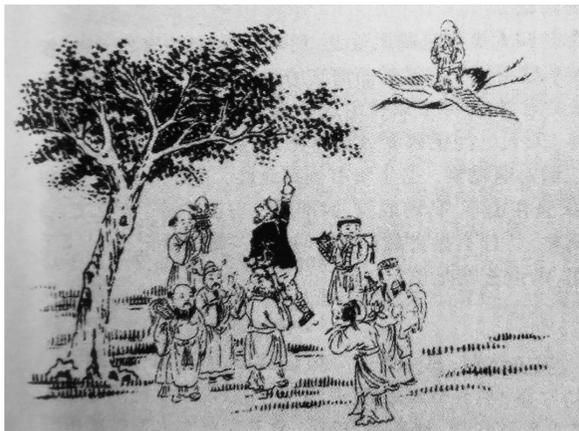
众多与吕仙有关的传说，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蛇山临江处风景优美。自唐宋以来，如蚁般的文人墨客在蛇山吟风咏月，让诸多传说流播中华，我们才能在《黄鹤山志》中读到诙谐戏谑的《题词》：“红尘不到，羽客翩翩；曰王曰费，苟仙吕仙；梅花三弄，响遏云边；骚人韵人，翰墨结缘；此山此楼，终古岿然。”是啊，不管传说如何，此山此楼，作为一种文化，都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存。

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写过回忆文章，其中就提到了到吕祖阁参拜的往事：

1933年，由于父亲在武汉参与农民银行筹建工作，我们借住在粮道街靠近昙华林一家老宅内。我与姐姐在胭脂路小学读书，记得学校在蛇山上，风景非常优美。有个星期天，父母带我们去黄鹤楼游玩，全家走在久经沧桑的石板路上，经由手工业匠人聚集的青龙巷，出巷口不久便到达黄鹤楼。我们在奥略楼上饮茶，远眺江景与汉水两侧的汉阳与汉口，饭后又到吕祖庙参拜，并且走近

“孔明灯”仔细端详。这才发现，我们是站在突出于江岸的黄鹄矶上，只有站在此处的视角与视野，才能真正领略到“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情境。

有意思的是，近代蛇山上的纯阳楼也是纪念吕仙的，这个西式建筑因其上有一个瞭望塔楼，曾作为观察武昌城火警的瞭望楼，故而又称警钟楼。但奇怪的是，诸多涉及蛇山历史的书籍和文章，都绝口不提纯阳楼，硬生生地把纯阳楼湮没在了警钟楼中，让纯阳楼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仙人跨鹤而去图

今蛇山也有吕仙洞，是一个新开凿的洞穴，内设有吕仙平卧像以及香炉等，雕像长3.1米，高1.7米，重5吨。

古往今来，有这么多的历史名流涉足蛇山，有这么多值得讲述的故事，有这么多值得书写的文化，蛇山真是值得细细的品味啊！

董玉梅，武汉地方志专家、武汉文史馆馆员

武汉坤伶“小京班”

◇ 龚宝珣 胡萍

武汉市青年京剧团成立于1953年12月，持续到1969年底。该团创始成员皆由女性组成，活跃在武汉戏码头，深受观众喜爱，是武汉京剧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武汉解放后，汉口民众乐园有两个专业京剧团体长期驻场表演，一是武汉京剧团在“大舞台”（后更名为江夏剧院）演出，一是青年京剧团在二楼剧场演出。由于我国京剧界男女分班的规矩由来已久，男班称之为“大京班”，女班称之为“小京班”，而这一时期“大京班”指的是武汉京剧团，青年京剧团就被亲切称之为“小京班”了。

目前，“小京班”成员大多离世，在世的几位也病痛缠身、记忆含混。2017年，一个机缘巧合，我们认识了曹文慧女士，初

晓了这一段历史。曹文慧是青年京剧团首任团长、老生坤伶焦淑良的次女，也是该团并入武昌县京剧团时期的重要老旦演员，至今仍和丈夫、武生演员周友芳活跃于武汉京剧圈，在京剧票房担任艺术指导，从事京剧教学与推广工作。

由此，我们运用口述研究方法，对曹文慧、曹文敏（焦淑良三女）、周友芳，创始成员张明霞、胡文珠，后任团长宋庆生、副团长卜玉兰等知情人，进行深度抢救访谈，为武汉京剧史积累口述史料，填补这一具有重要价值课题的研究空白（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2019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武汉青年京剧团（1954—1970）的历史记忆挖掘与研究（19G030）结题成果）。

银都茶园“髦儿戏”

清末民初，汉口的戏曲演出形式逐渐演变成“茶园戏院”。1899年，大智门外的如寿里出现了第一家茶园——丹桂茶园演出京剧。

1903年，后城马路与歆生路（今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出现了一座群仙茶园，1907年改称怡园，是最早的京剧坤班演出场所。那时，京剧演员男女不许同台，坤班来汉只能在特定的几个茶园演出。坤伶地位低、受歧视，演出的戏被称之为“髦儿戏”，多少带有轻蔑的意味。

本来，京剧要在汉口“打码头”，没有过人的真本事是很难立足的，坤班更是难上加难。但“髦儿戏”创造了骄人的业绩，如老生孟小冬就在汉口连演三个月，花脸云中雷在老圃茶园唱戏“声震如雷”，因而有着良好的戏迷基础。她们的招式不输须眉，又很少摆谱，更有亲和力，更受武汉人的追捧。怡园之外，后城马路北京街（今中山大道北京路）附近的“新民”等几家茶园均有坤班专门演出。

坤伶多是苦出身，青年京剧团首任团长焦淑良生于1934年，身世悲凉。战乱年代，为躲避日军轰炸汉口，她随家人沿长江逃难至重庆万县，途中走失，由一张姓木匠家庭短暂收留，但因其没有抚养能力，最终被转卖至长江上一户焦姓跑船人家，名字也为焦姓人家所起。

焦淑良十二三岁初识京剧，教戏先生是跑船途中遇到的一个琴师票友，以学习马派老生唱腔为主，唱得最多的便是马派经典《甘露寺》《法门寺》《三娘教子》的唱段。1949年解放，焦姓人家结束漂泊生活定居

武汉，住在民众乐园附近的后花楼街。焦淑良参加了政府主办的识字班，才有机会学写字、学文化。

青年京剧团的女演员出身大多如此，其中孤儿很多，均未进过正规科班，以“家学”为主。为了生计，她们学会一些唱段后，便去茶园慢慢磨练，直至小有名气。解放初期，这些女演员慢慢聚集起来，在江汉路与江汉二路交汇处（今武汉中心百货商店旁）的银都茶楼固定演出。

银都茶楼起初并非京剧演出场所，解放前是舞厅，解放后逐渐成为京剧茶楼。一些女演员因扮相儒雅、演技熟练、唱腔地道而迅速蹿红，她们分别是马派老生焦淑良、杨派老生周韵琪、武生汤筱华、小生廖明珠、青衣张明霞、铜锤花脸胡文珠、花旦郑美君、小花脸李少芬，名噪一时。

1950年代初，这8位名角以女扮男装的特色，在京剧界占了一席之地。据老戏迷和老街坊回忆，银都茶楼的老板专门请了一位教戏先生训练她们，以“唱”“念”为主，主要满足茶客吃茶点戏的需求，故多是唱折子戏，整本演出几乎没有。

这一时期，女演员的收入方式和解放前类似，拿包银，拿赏钱。茶客点戏最多、包银最多的当属铜锤花脸胡文珠、马派老生焦淑良、杨派老生周韵琪和大青衣张明霞了。在北京、上海京剧坤班走向没落之际，武汉这个京剧坤班异军突起，成为我国京剧史上诞生较晚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京剧坤班。

民众乐园“小京班”

解放初，武汉较为有影响的戏曲剧场共有15个。1951年1月，武汉市戏曲改进

协会成立，下设京、汉、楚、评、豫、越等分会。1951年5月，根据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推进以“改戏，改人，改制”为中心的“三改”工作，由周信芳任总团长的中南京剧工作团，将武汉的京剧事业再一次推向巅峰。1952年，因中南军政委员会撤销，中南京剧工作团划归武汉市文化局管理，改名为武汉市京剧院，从此开启了民众乐园改革的序幕。

在市文化局局长巴南冈的领导组织下，武汉戏曲曲艺演出团体陆续组建，民众乐园形成了京、汉、楚、评、豫、越六大剧种齐备的戏曲演出场所。随着私营剧场公有化的推进，银都茶园于1953年12月完成公有制改造，定名武汉市青年京剧团，整体迁入民众乐园，演出场所定于二楼靠中山大道一侧。与其他驻场演出团体略有不同，青年京剧团经营“自负盈亏”，采用与民众乐园折账的方式，规定了茶钱的标准，所有演职人员实行薪金制。



《樊江关》薛金莲，胡美玉饰

青年京剧团阵容初具规模，宋庆生等回忆整理了一份难得的名单：主要演员焦淑良（老生）、周韵琪（老生）、汤筱华（武生）、廖明珠（小生）、张明霞（青衣）、胡文珠（铜锤花脸）、郑美君（花旦）、李少芬（小花脸）、王蔷（龙套）；乐队马炳泉（司鼓）、张瑞庭（司鼓）、憨广兴（大锣）、王先汉（钹）、赵鸿全（京胡）、陈雪朋（二胡、月琴）、王秋生（三弦）、朱连甫（京胡）、管式达（大锣）；其他演员卜玉兰（老生）、李韵虹（老生）、李惠芳（青衣）、胡美玉（花旦）、马玲玲（花旦）、王玉萍（武旦）、范云奎（花脸）、陈慧平（花脸）、李少芳（花脸）、龚寿华（小生）、伍巧云（老旦）、郑丽君（老旦）、范秋雯（青衣）、张婉秋（彩旦）、陈丽珍（小生）、王美英（小花脸）、陆翠英（老生）、曾琴芬（龙套）；工作人员许连生（大衣箱）、徐万高（二衣箱）、姚老三（三衣箱）、李文钊（刀枪、把子）、李会中（灯光布景）、顾树堂（会计）、沈文鼎（出纳、字幕）等。

此时，青年京剧团组成了第一届领导班子，团长焦淑良，副团长周韵琪、汤筱华和王蔷，焦淑良年仅19岁。至此，二楼剧场挂上了剧团8位头牌的16张大海报（每人各一张戏装剧照与生活照），来往观众时常驻足谈论：这剧照真的是女同志吗？16张大海报成为“小京班”的名片，无论是驻场演出还是外出巡演，都成为吸引观众捧场的重要宣传手段。8位主演更在戏迷的心中扎下了根，去民众乐园听“小京班”的戏愈发成为乐事。

青年京剧团由民众乐园演出公司负责运营，每月分得固定收入3200元，几年后上涨到4000元。因效益出色，全团40多名职工的工资是相当可观的，其中小生廖明



从左至右：前排李少芬、廖明珠、汤筱华、伍巧云、焦淑良、胡美玉、曾琴芬、陈雪朋，后排陈惠平、范秋雯、卜玉兰、龚寿华、范云奎等，摄于武汉东湖

珠最高为每月 68.5 元，其余主角均在 60 元以上。

据老戏迷回忆，“小京班”每天下午、晚上各一场戏，演出很敬业，非常受欢迎。剧场常常坐得满满当当，想要个好位子必须提前占座儿，一些熟悉的观众会偷偷塞些糖果给演员的孩子帮忙占座，若是碰上她们的拿手戏，走道上都站满了人，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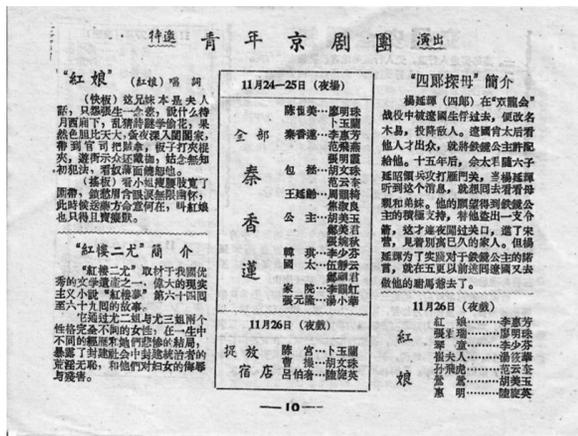
当家青衣张明霞回忆说：我最喜欢听焦淑良团长和铜锤花脸胡文珠的唱。我进团时十七八岁，焦团长只比我大一岁，既是管理者又是主演，非常不容易。在我的记忆中，团里非常忙，每天都是不停地排戏、搭戏、赶戏。我们团 1953 年 12 月一成立，就开始准备元旦演出，忙完元旦又忙春节，一场接着一场，红红火火的。每次终场都有观众舍不得走，好多拉着剧院经理或服务员的

手：“请你一定真实告诉我，这到底是不是男同志唱的？这声音怎么可能是女同志唱的？”经理总是耐心回答：“舞台上确实没有男同志，台下的工作人员倒有男同志。”说完哈

哈大笑。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时，总是感到满满的欣慰。

民众乐园介绍青年京剧团的戏报很多，以第 138 期为例，除封面外还有整整四版。日戏夜戏连轴转，折子戏全本戏都能演，多是看家戏，三国、红娘、杨家将三大系列最受欢迎。女须生、女花脸与男旦类似，有着程式化的舞台语汇，通过自身别具一格的表演风格，争取到大批戏迷的青睐。

青年京剧团每年都要去外地巡回演出，起初由市文化局或民众乐园安排，由于观众反应热烈而多了起来。巡演途中，陆续自行接一些演出，依



民众乐园戏报 138 期封面、内页

靠长江这一黄金水道跑“水码头”，上至荆州、宜昌，下至长沙、岳阳，转战九江、南昌、铜陵、芜湖，“小京班”名气越来越大。

后期担任团长的琴师宋庆生回忆：剧团坚持跑大码头赚名气，跑中小码头提高收入，一个月有八九千块的进账。每年在外演出的时间有五六个月之多，快乐又辛苦。女演员舞台上神采飞扬，转场路上拖儿带女，常有背上捆着没有断奶的孩子，照样抬衣箱、扛道具四处奔忙。



武汉市青年京剧团全体合影，摄于武汉中山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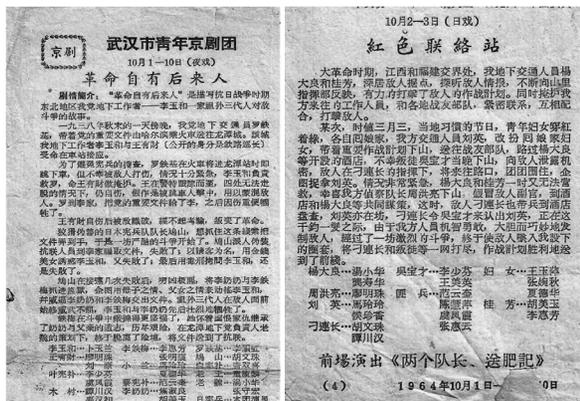


武汉市青年京剧团 1963 年巡演节目单

现代戏挑战“女扮男”

论传统的做工与唱工，“小京班”大多演员无论本工、应工演来得心应手，各种角色也栩栩如生，但在武戏方面就力不从心了，即使戏中遇到相关情节也只能掐头去尾改掉。张明霞回忆，若武汉京剧团在四楼贴出拿手好戏《大闹天宫》的海报，我们二楼就可以放假休息了，因为观众肯定上楼看热闹去了。

1963 年，对青年京剧团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从武汉戏校分来了 14 名学员，尤其有武生唐幼麟、童康麟等 8 名男学员，开始上演《十字坡》《三岔口》等精短剧目，武戏也有些看头了。



民众乐园 1964 年国庆戏报

演员阵容的壮大，使青年京剧团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据宋庆生回忆：新成员都是科班出身，功底是好的，整个剧团的演出更具专业化。1963—1964 年期间，接到外地的演出邀请无数，尤其是 1963 年创下了巡演 8 个月的记录，我背着胡琴随剧团全国到处跑。最值得自豪的是 1964 年在安徽铜陵，与杨秋玲老师的中国京剧四团相遇“打对台”，剧目同为《杨门女将》（中国京剧

四团原创)，可当天他们只卖出9张票，我们卖到满场，最终四团把卖出的票退了，杨秋玲亲自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进入1960年代，戏曲界倡导“三并举”，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创作新的历史剧目。”从民众乐园的戏报可以看到，1964年3月11日至3月20日，青年京剧团上演的剧目，以《春草闯堂》《包公智斩鲁斋郎》《赤桑镇》《望江亭》

等传统戏为主，也出现了《江姐》《芦荡火种》等现代戏。国庆期间，全是现代戏——《革命自有后来人》《两个队长·送肥记》《红色联络站》。到1965年，演出已完全没有传统戏了，当年4月的戏单上是《江姐》《党的女儿》《红管家》等。

京剧坤班饰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一套传承下来的表演程式，可谓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但是，用坤角塑造现代人物，尤其是男性英雄人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个年代的女性较少剪短发，更没有人剃光头，女演员只能将一头秀发塞进头套里，试图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戏坤角演出形式——这是“小京班”在生存与发展中的艰难选择。

“文革”开始不久，“女扮男”难以为继，加之民众乐园歇业，境遇每况愈下。1970年元月，青年京剧团大部分演员下放至武昌县（今江夏区），与武昌县楚剧团合并组建新的武昌县京剧团，宋庆生任团长。这个中国最后的京剧坤班，就这样结束了历史使命。



1980年代武汉市青年京剧团重组汇演合影，前排京剧名家许连生，后排廖明珠、李少芬、焦淑良（从左至右）

1980年代，市文化局有恢复青年京剧团的想法，组织原主要演员汇演，赢得了老戏迷的热烈反响。但由于全国京剧出现下滑之势，武汉又有武汉市京剧团和湖北省京剧院两个专业团体，本地市场过于饱和，最终未能重建。

武汉市青年京剧团这个京剧坤班，与武汉的码头文化、戏曲茶园文化、城市音乐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汉派京剧”的创造者之一。本文首次梳理了其发展历程，初步还原它打下的文化烙印，希望能抛砖引玉，触发对武汉戏码头及坤伶相关历史记忆的进一步挖掘。

龚宝珣，江汉大学音乐学院讲师；胡萍，江汉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本刊 2022 年总目录

老字号脉

- “四季美”绽放时代之美 张德隽 (1.4)
- “汪玉霞”人的坚持与担当
熊年顺 (口述) 熊琪明 (整理) (1.8)
- “曹祥泰”的百年风华 卢耀武 (2.4)
- “老通城”的艰辛创业之路 曾宪德 (2.9)
- “冠生园”带你重回老味道 唐 星 (3.4)
- “德华楼”传承百年向未来
张向阳 (口述) 刘 敏 (整理) (3.8)
- 谈炎记续写“水饺传奇” 丁建华 (4.4)
- 老万成为“火炉”送清凉 刘汉华 (4.7)
- 大中华光耀中华饮食经典
卢永忠 (口述) 王艳红 (整理) (5.4)

扬子江：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离宗

梅红运 (5.9)

汉口亨达利的百年时光

潘曾琦 (口述) 方三勤 (整理) (6.4)

城楼寨茶走进世界军运会 王 飞 (6.8)

品芳，为武汉人守住那份记忆 于 刚 (7.4)

大兴蜂业，酿造甜蜜的事业 黄朝阳 (7.8)

波衣也：三代传承的“编年史

刘 群 (口述) 刘宝森 (整理) (8.4)

“精益”眼镜百年“求精” 钟少斌 (8.9)

黄鹤楼酒，百年汉汾飘香 许 鹏 (9.4)

苏恒泰，延续城市根脉 苏 峰 (9.8)

武汉荣宝斋“米寿”荣光

鲁 静 (口述) 胡晋鄂 (整理) (10.4)

武汉国漆：老字号新传奇

余继先（口述） 吴红云（整理）（10.8）

高洪太铜锣“一锤定音”

朱汉桥（口述） 方三勤（整理）（11.4）

盛锡福帽子“冠盖华中” 任炳环（11.8）

武汉老字号：一段记忆，一片乡愁——《品读武汉老字号》代序

周德钧（12.4）

三镇拾遗

“怕上春风六度桥”——“六渡桥”本名“六度桥” 冯天瑜（1.14）

汉口岳飞街3号“浮现”徐源泉公馆

刘汉桥 田联申（1.16）

围着铜人像转一转 潘奠元（2.27）

汉口老里份“东山里”题刻初探

胡全志（2.31）

从小首义公园到大首义公园 昌庆旭（3.23）

东西湖区地名“三只虎” 王琼辉（3.28）

1972：新洲倒水改道入江 李少武（4.24）

汉阳老城访“旧学” 施惠芳（4.29）

汉阳剧场的时光流影 麻建雄（5.22）

青山有座青山矶 桂 枫（5.26）

武汉解放时一份通告的两个版本

田联申（6.25）

我与“贱三爷”的不解之缘

沈远义（口述） 宋 艳（整理）（6.28）

清末民初积玉桥 孙庆力（7.24）

我家曾在宗关住 郭 迅（7.27）

追寻气象学家涂长望的武汉足迹

刘珍秀（8.23）

大董家巷片区：汉口老城的缩影

王汗吾（8.27）

“汉裌”风华

胡来旺（9.26）

白求恩来华首诊的“五医院”

麻建雄（9.30）

黄陂籍院士梁骏吾的“科技之家”

杜春华 裴高才（10.21）

赤壁大战遗迹江夏寻踪 祁金刚（10.27）

黄鹤楼下收藏“黄鹤楼” 朱汉昌（11.19）

汉口徽商与汉正街新安书院

王 光（11.24）

汉口“梁记药房”探访 韩少斌（12.17）

汉阳公园发现1964年“汉阳树”碑刻

胡全志 严 涛（12.20）

九城同心

黄冈历史文化简介 李青松（2.15）

黄冈共存社独立展开建党活动

董志伟 史智鹏（2.17）

黄梅戏“回娘家”四十年 章华荣（2.22）

黄石历史文化简介 方 格（3.12）

汉冶萍：缘何花开黄石？ 朱俊峰（3.14）

黄石西塞神舟会 吕永超（3.18）

咸宁历史文化简介 金顶挑（4.12）

千年砖茶羊楼洞 冯晓光（4.14）

诞生于通城的全国首个县级红色政权

胡沙岸（4.19）

鄂州历史文化简介 夏建国 杨小杰（5.13）

武昌鱼史考 艾三明 郭晓春（5.15）

打响鄂南抗日游击第一枪

邓文兴 杨小杰（5.19）

孝感历史文化简介 胡绍翔 黄念军（6.12）

一剪神韵夺天工 周 芳（6.14）

老澧河“新生记” 董晓芳（6.19）

潜江历史文化简介 余晓勤（7.12）

闪耀华夏的潜江李氏两兄弟 别国庆（7.14）

潜江虾稻正年轻 王秋高（7.19）

- 天门历史文化简介 嘉 木 (8.12)
- 一代茶圣出竟陵 肖新国 (8.14)
- 百年侨乡的万里传奇 胡 华 (8.18)
- 仙桃历史文化简介 苏 林 (9.13)
- 沔阳三蒸的前世今生
陈锡椿 郭 艳 (9.15)
- “亚洲体操之乡”是怎样练成的
郭 艳 (9.20)
- 吴王钓鱼台遗址保护始末 艾三明 (10.13)
- 文化名人荟萃向阳湖 李城外 (10.16)
- 起底江汉石油大会战 关贤安 (11.12)
- 情注这方红土地——董必武与黄石
朱俊峰 (12.11)

委员天地

- 履职十五年，为百姓“算账”
周永先 (1.29)
- 在汉再续“从政”生涯
魏启响 (口述) 郑雅飞 (整理) (1.33)
- 拧紧人生发条，干出青年政协委员的样子
王 涛 (口述) 王欣然 (整理) (2.34)
- 黄鹤振羽，古城新貌背后的政协力量
亢德芝 (2.38)
- 下好政务服务“先手棋”
吴余龙 (口述) 郑雅飞 (整理) (3.31)
- 美美与共，为他人编织美丽人生
谭文浩 (口述) 英 飞 (整理) (3.35)
- 多重角色的文艺女兵
毛志红 (口述) 闻 政 刘桂英 (整理) (4.32)
- 愿做青山的一根绿竹
刘进波 (口述) 郑雅飞 (整理) (4.36)
- 在城市“修补”中自我完善 董 菲 (5.29)
- 脚踏泥土 利他致远 刘 鹤 (5.34)

- 让每一份提案都掷地有声
程 祯 (口述) 郑雅飞 (整理) (6.32)
- 乡村振兴路上的“她力量” 李茺茺 (6.35)
- 半生书香牵系“三世”政协情缘
卢 纲 (7.30)
- 让书籍成为委员进步的阶梯 万 松 (7.34)
- 推广阅读是时代使命 李小曼 (8.33)
- 读书让我守信念葆初心 付 恺 (8.36)
- 最是书香能致远 梁 星 (9.34)
- 把读书作为履职的必修课 赵 起 (9.37)
- 阅读孕育文艺人生 虞旻子 (10.31)
- 点亮阅读空间 续写时代知音 王 铮 (10.34)
- 在学中悟，在习中成 刘珍秀 (11.28)
- 数字传承文明 阅读创造未来 陈 曲 (11.31)
- 绿水青山好作伴 张 继 (12.25)
- 我走过的万里家访路 施 婧 (12.28)

商聚汉皋

- 我从水乡走来
蒋 喜 (口述) 严 濂 (整理) (1.37)
- 自强不息方显生命本色
柯于亮 (口述) 谢 定 (整理) (1.42)
- 奔跑者的足迹 杨须红 (2.42)
- 大健康产业的逐梦者
李德兰 (口述) 严 濂 (整理) (2.46)
- 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
盛祝云 (口述) 闻 夕 (整理) (3.43)
- 烟火家常暖人心
翁子齐 (口述) 严 濂 (整理) (3.47)
- 居人思客客思家
张 杰 (口述) 严 濂 (整理) (4.39)
- 趟出一条多元化发展之路
顾 枫 (口述) 闻 夕 (整理) (4.43)

从“插座大王”到“豆芽大王”

余建栋(口述) 许 濛(整理) (5.42)

踏准节奏追梦大健康 沈献礼 (5.46)

我的人生格言是专注和创新

常发文(口述) 田 勇(整理) (6.39)

匠心营造 智慧生活

王升洪(口述) 严 濂(整理) (6.42)

大武汉让我们不负年华 于天宝 (7.56)

创与守两轮前行

王炎发(口述) 李 安(整理) (8.39)

创业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李庭芳(口述) 闻 夕(整理) (8.42)

一名工程兵的科创理想

王剑(口述) 严 濂(整理) (9.40)

医者的远方

李宗族(口述) 严 濂(整理) (10.37)

传承奋斗基因,续写新时代烘焙风云录

陆 伟(口述) 南 方(整理) (11.35)

“健康”是人生头等大事

董林艺(口述) 舒 赢(整理) (12.32)

往事漫忆

回忆武汉海外统战工作的发端和拓展

王功安(口述) 范前锋(整理) (1.19)

武汉民盟建言组建新江汉大学

郭友中(口述) 宋 薇(整理) (6.46)

武昌首义路93号二三事 李华章 (8.63)

走近聂华苓 尹新秋 (9.61)

科技人文相宜 学术人品俱佳——送别杨叔

子校长 吴廷俊 (11.56)

古德寺腾退记 麻 杰 (12.43)

山有黄门

开沅师为我“站台”记 涂文学 (1.24)

在章开沅先生身边十七年 刘家峰 (6.49)

裴传雯教授的“那一句” 周希正 (7.51)

精工匠心

我要认真修好每一列地铁列车

张 兵(口述) 白爱萍(整理) (1.46)

我的人生就是逆水行舟

张华华(口述) 白爱萍(整理) (3.39)

都市史话

和利冰厂与汉口城区的演进 侯红志 (1.50)

武钢1号高炉的使命与光荣 钟 钢 (2.50)

东湖风景区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
董汉芳 (2.56)

晴空呼号:汉口新华广播电台诞生

王汗吾 (3.51)

清末武汉防护染疫章程出台始末

李笙清 (3.54)

“魏清记”营造建筑经典 王 钢 (4.60)

武汉老会馆大起底 万建辉 (5.50)

汉口江滩一期工程回顾 吴世纬 (5.56)

汉口西商跑马场图史 侯红志 (7.60)

历史文献中的武汉中元节俗 王 钢 (8.57)

鸡公山上的老汉口史迹
靳小蓉 万建辉 (9.55)

武昌著名的方物菜蔬 刘谦定 (10.54)

1934年的汉口五家电影院 田联申 (10.60)

探寻蛇山上的古刹道仙(上)
董玉梅 (11.49)

探寻蛇山上的古刹道仙(下)
董玉梅 (12.49)

史海钩沉

- 对乾隆钦定“盘龙城”的史实梳理
裴高才 (1.55)
- 湖北模范监狱幸存武船老厂区
韩少斌 罗时汉 (1.61)
- 旧时武汉商行的行话暗码
杨普社 张丽琴 熊恒多 (2.61)
- 汉口南京路“吴家花园”探疑
韩少斌 (3.58)
- 竹枝词中的汉口变迁
沙 月 (3.61)
- 探寻蛇山历史深处
董玉梅 (4.47)
- 金口槐山访名胜
刘谦定 (4.55)
- 英国发现 1927 年中华全总致驻华水兵公开信
胡全志 范 榕 (5.60)
- 从汉口电工器材厂到长江电源厂
方 宏 (6.57)
- “顺丰茶栈”与顺丰砖茶厂关联考
韩少斌 (6.62)
- 武汉抗战孩子剧团拾零
王豫丰 吴文俊 (7.42)
- 《围垦生活》再现东西湖围垦工程
王弘宇 (7.47)
- 武汉沦陷前后日本策划成立伪江汉政府始末
邓正兵 李 静 王兵强 (8.45)
- 汉口法租界梅医生纪念碑
章 辉 袁厚翔 (9.50)
- 国庆十周年湖北美术展览会
张明建 李瑞洪 (10.41)
- “三人照”上的高欣荣与林巧稚
姬绍先 (11.60)
- 武汉坤伶“小京班”
龚宝琦 胡 萍 (12.54)

人物春秋

- 1957, 初见大师陈伯华
俞啟凤 (5.38)
- 《墙头马上》的台前幕后
俞啟凤 (6.54)
- 从哈尔滨南下到武汉
佟 心 (7.37)
- 城市规划专家孙宗汾的不凡人生(上)
张智海 (8.53)
- 城市规划专家孙宗汾的不凡人生(下)
张智海 (9.44)
- 武汉抗战时期的陈布雷
邓正兵 刘佳欣 (10.46)
- 检验科长眼中的“洋厂长”格里希
曹小麓 (11.40)
- 郑凯卿:“文华”走出的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
付 强 (12.37)

目录索引

- 本刊 2022 年总目录 (12.60)